



《春帆樓》

馬關條約130年紀念

Shunpanro 130 Years Sinc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延陵科學綜合室 格物研究組

Email address: hongkongensis@gmail.com

2025年12月24日



序言一：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歷史的灰燼與今人的冷漠



序言一：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歷史的灰燼與今人的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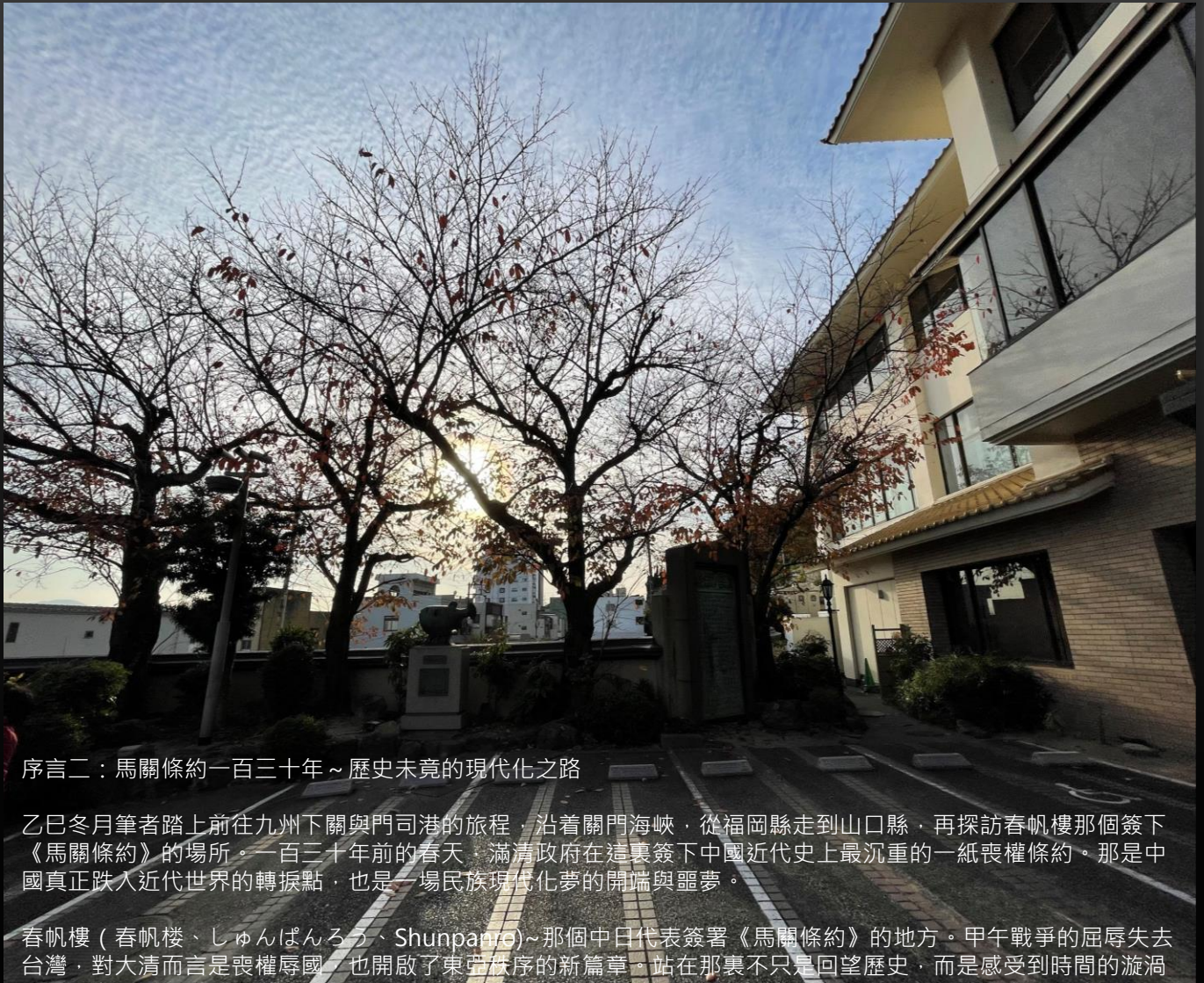
那是一個風微晴朗的午後，筆者來到下關。眼前海潮翻湧，瀨戶內海的浪花不息拍打石岸。這裡，是平家最後沉沒的地方～壇之浦。八百多年前，平家在此覆滅，卻有着一位雙眼失明彈琵琶的琴人，到處唱頌《平家物語》的故事，後來被十九世紀日本怪談小說之父小泉八雲稱為「無耳芳一」的老人。驕矜的貴族隨波而去，連同他們的榮華夢影一起被潮水掩埋。歷史就在這片水域中流動，不息也無情。站在關門海峽岸邊，眼前湧動的不只是水流，而是兩道疊影般的歷史——是壇之浦，平家覆滅之地；一是馬關，李鴻章被迫簽字的地方。千年海潮，不停拍打同一片水域，卻見證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沉淪，一個是武士政權的終章，一個是東亞大國的屈辱。

然而站在海風之中，心頭浮起的卻不是武士的詩意悲壯，而是另一場民族的懺悔。1895年的春天，李鴻章在這裡被逼簽訂《馬關條約》。一紙和約，剝去的不僅是台灣與遼東，更是近代中國的尊嚴與血色。那一筆筆「賠款」，既是屈辱的符號，也是醒不來的夢魘。李鴻章在此承受刺殺，捂着胸口的血跡，最後仍要坐到談判桌前，簽下那份《馬關條約》。二億兩賠款，台灣與澎湖的割讓，朝鮮「獨立」的強迫承認，從此打開日本殖民與東亞權力重組的序幕。這不只是一紙條約，而是寫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一道血槽。

一百三十年轉瞬如飛灰，歷史彷彿被時間磨平。中國人總愛重提「國恥」，卻很少真正理解這兩個字的份量。紀念者有之，感慨者亦有之，但能從歷史中提煉力量者寥寥。歷史不是傷感的舞台，也不是官方儀式的口號；它應該是民族自省的鏡子，是每個人心底的清算。可惜，當年李鴻章的嘆息，如今只被當作教科書裡的注腳，而歷史本身早被政治的濃霧掩蓋。更可悲的是，今日之中國，並未真正走出權力的輪迴。歷史的教訓未被吸收，強權與傲慢卻換了面具再現。那些掌權者以「民族復興」為口號，卻以恐懼與控制維持榮光。他們以為壓制異聲便能重現強國之夢，卻忘了真正的力量來自人民對歷史的清醒。

今日的統治者，高舉「百年國恥」「民族復興」的旗幟，把近代史當成動員工具，卻極力壓抑真正的歷史討論。歷史被剪裁成宣傳片段：可以無限放大外侮，卻必須淡化內部失敗的根源，可以痛斥帝國主義，卻絕不鼓勵公民把同一套標準用來審視本國權力。於是，「不忘國恥」變成一種選擇性記憶——該記的記得太牢，不該想的統統抹去，最終從來學不到真正的教訓。更諷刺的是，那種曾令清帝國付出慘痛代價的體制病灶，並沒有在百年動盪後徹底剷除。強權依舊，只是披上了另一種革命與發展的外衣。言論被約束，史學被馴化，教育變成單向輸出的合理化工程。掌權者亦步亦趨地複製晚清的錯誤，恐懼社會的自主與多元，害怕人民真正理解歷史，於是把一切批判都視為威脅，而不是救藥。在這樣的結構下，「歷史」不過是統治者手中的工具，而不是人民手中的利劍。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壇之浦的潮水依舊拍岸。海風冷峻，像在訴說千年來人類不變的輪迴：一方敗亡，一方驕傲，歷史終究不會開口。只是我們，依然未學會傾聽。

序言二：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歷史未竟的現代化之路



序言二：馬關條約一百三十年～歷史未竟的現代化之路

乙巳冬月筆者踏上前往九州下關與門司港的旅程，沿着關門海峽，從福岡縣走到山口縣，再探訪春帆樓那個簽下《馬關條約》的場所。一百三十年前的春天，滿清政府在這裏簽下中國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紙喪權條約。那是中國真正跌入近代世界的轉捩點，也是一場民族現代化夢的開端與噩夢。

春帆樓（春帆楼、しゅんぱんろう、Shunpanro）~那個中日代表簽署《馬關條約》的地方。甲午戰爭的屈辱失去台灣，對大清而言是喪權辱國，也開啟了東亞秩序的新篇章。站在那裏不只是回望歷史，而是感受到時間的漩渦仍未平息當年的「現代化之夢」，曾被許多人寄託為中國的希望，如今卻在現實中變成無數人心裏的落寞，遠眺春帆樓俯瞰海峽，波濤依舊洶湧，可時代卻似乎沒有改變多少。一百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表面上已經是高樓林立、科技昌盛的大國，但這副繁榮的皮相掩不住政治的陰影與體制的僵硬。

從甲午到今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發達」或「強盛」，而是這個國家從未完成心靈與制度的現代化，只是從皇權變成了黨權，從迷信帝制轉為迷信權威。那種不透明的政治文化，將現代中國變成了一個資訊封閉、言論被禁錮的空間。所有的歷史教訓都被改寫成「勝利敘事」，失敗與反省被抹去，就連人民都習慣在「繁榮的幻象」中自我安慰。這正是馬關以後遺留下來的最深創傷，個從未真正敢於面對自身弱點的民族。

日本之行恰逢聖誕節將至，也正值紀念香港保衛戰。想到1941年的冬天，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終於蔓延至我們香港的土地。香港在戰火中淪陷，那場戰爭不僅是東亞地緣霸權的延續，更預示了近代中國政治宿命的延伸，從清末的崩潰，到民國的戰亂，再到今日的專制復歸。曾經的香港，代表着另一種可能！法治、自由、透明，這些理念是近代化的靈魂。可是短短幾年，那些價值在權力的壓制下逐漸消散。從新聞自由被窒息，到公民社會被瓦解，香港變成另一個歷史的試驗場。那種熟悉的歷史迴圈令人痛心：從甲午戰敗到今天，「改革」的口號喊了一個世紀，結果卻是倒退回原點。

回望春帆樓那寧靜的日式庭園，內心卻感到無限沉重。歷史並非遙遠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警鐘。若制度仍拒絕光明，若社會仍習慣沉默，即使再過一個一百三十年，中國仍不會真正「現代化」。歷史不是讓人緬懷的裝飾，而是讓人警醒的鏡子。願有一日，中國與香港都能擺脫虛假的繁榮，回歸理性、自由與人性的良知，那才是對甲午戰爭真正的紀念。（2025年.平安夜）

《遊馬關憑弔》

平源合戰埋枯骨
關門海峽人獨立
安德天皇壽終去
壇之蒲下神器失
赤間春帆為鄰李
道別匆忙見芳一
任公夜泊馬關岸
清國平家同一哀
百三周期來憑弔
有話問候港炎悲
日月無光珠不再
下關夕陽白浪飛
明治有幸振興國
光緒有淚困瀛臺
中華之恥多奸佞
赤魔坑禍好山河
李鴻章嘆可無奈
伊滕陸奧永輝光
後人思考前人事
愧疚無能興家邦
步下長階多思緒
回頭剛好成往事
引我寺前浪濤急
完章放下手合拾

2025年冬月：日本國九州

上圖：一百三十年後的馬關海峽，現稱為關門海峽。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舊春帆樓於1945年美軍空襲燒毀，現今只能透過遺瓦作回顧它的歷史。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館內中央展示16張由濱離宮的大小椅子、法國製暖爐及草花紋蒔繪硯箱及墨水瓶。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春帆樓的歷史沿革消失再重建



上圖：舊春帆樓於1945年美軍空襲燒毀，現今只能透過遺瓦作回顧它的歷史。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下關春帆樓的歷史沿革

一、舊春帆樓的原始建物結構

春帆樓的原始建物源自19世紀中葉的阿彌陀寺住持所，1875年神佛分離後廢棄。1877年，來自中津藩的蘭醫藤野玄洋購入該地，設立「月波樓醫院」，並提供休養設施，這成為春帆樓的前身。1884-1885年藤野玄洋去世後，其妻藤野滿在伊藤博文建議下改建為割烹旅館，並命名為春帆樓。原春帆樓是一棟兩層樓的日本式木造小樓，位於下關市的高台上，俯瞰關門海峽，具備凌空而飛之勢。雖然文獻未明確記載使用瓦片，但作為明治時期典型日式建築，多以木框架搭配瓦頂建成。

一a、日本選擇春帆樓談判的理由

伊藤博文選擇春帆樓的地理位置俯瞰關門海峽，讓日本軍艦頻繁進出成為談判期間的視覺威脅，強化日本軍事優勢對清朝代表的心理壓力。軍事展示作用春帆樓高台上直接面對海峽，李鴻章一行每日目睹殲滅北洋艦隊的日本軍艦駛向大陸，營造「炫武」氛圍，凸顯清廷海軍崩潰後的絕望。此設計有利伊藤博文等日方施壓，延續甲午戰爭勝利者的主導地位。交通與便利性，從天津至下關僅需三至四天船程，比廣島更短且無需換船，降低李鴻章旅途風險，卻仍讓日本維持主場控制。位置兼顧雙方急促談判需求，但海峽景觀持續提醒清方戰敗現實，加劇不對等氛圍。另一個人與地緣因素，伊藤博文出身長州，春帆樓為其家鄉河豚名店，他曾親筆命名並頒發首張河豚許可證，選擇此地兼具盡地主之誼與主場優勢，展現下關港口繁榮。

談判策略意圖，伊藤急於速戰速決，早願遷就地點甚至考慮旅順，但最終選春帆樓確保日本主導權，平衡各方意願並加速和談進程。伊藤博文與河豚料理的關聯被視為歷史軼事，具有高度真實性。解禁河豚的關鍵角色伊藤博文於1887年在下關春帆樓品嚐河豚後大讚其美味，隔年促成山口縣解除河豚禁食令，使春帆樓成為「河豚料理公許第一號店」，此後全國逐步解禁。歷史證據支持 多份文獻記載伊藤出身長州，早年即愛食河豚，甚至幕末時違禁品嚐，並親筆為春帆樓命名，後續多次下榻享用，直至1909年最後一餐皆為河豚鍋。



上圖：春帆樓過去為「河豚料理公許第一號店」現時仍以河豚料理在日本聞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下関春帆樓的歷史沿革



上圖：春帆樓的日本式木造二樓主廳，面朝關門海峽，設有長桌與巨燈。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一b、談判場地的布局

《馬關條約》談判的正式場地位於舊春帆樓的二樓大廳。該大廳為當時春帆樓的日本式木造二樓主廳，面朝關門海峽，設有長桌與巨燈，提供日方軍艦巡弋的視覺威懾，大廳中央作為會議室，置有從濱離宮賜予的16張大小椅子，按座位順序排列，每椅下方標註代表姓名，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相對而坐的高背椅，桌上鋪深灰桌布，配中國毛筆、硯台、墨水瓶及草花紋蒔繪硯箱。當年攝影技術雖存，但談判過程嚴密保密，無公開拍攝紀錄；日清講和紀念館依據伊藤博文回憶錄、李鴻章書信及目擊證詞推斷座位，如李鴻章居首、伊藤對坐。

歷經29天會談後於1895年4月17日簽署條約，《馬關條約》的原本分中日文各存一份，現分別收藏於中國與日本國家級機構。中文原本由中華民國繼承後，現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館，屬外交檔案類，不常公開展出，可透過故宮數位典藏系統查詢影本。

日文原本保存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東京），為明治時期外交文書核心，線上目錄可搜「下関条約 原件」，實物需預約閱覽。伊藤博文一行在《馬關條約》談判期間，主要住宿於春帆樓本身。春帆樓不僅是談判場地，亦為割烹旅館，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等核心代表全程下榻此處，享有河豚料理與眺望關門海峽的優勢，掌控主場節奏。清日分居安排相對地，清朝一行包括李鴻章駐於附近引接寺，經「李鴻章道」往返春帆樓，避免直接衝突並強化日方心理優勢。

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空襲春帆樓的消失(一)



上圖：日清講和紀念館於1930年代落成不久的明信片照片，與老春帆樓成為《馬關條約》談判的日本重要史蹟。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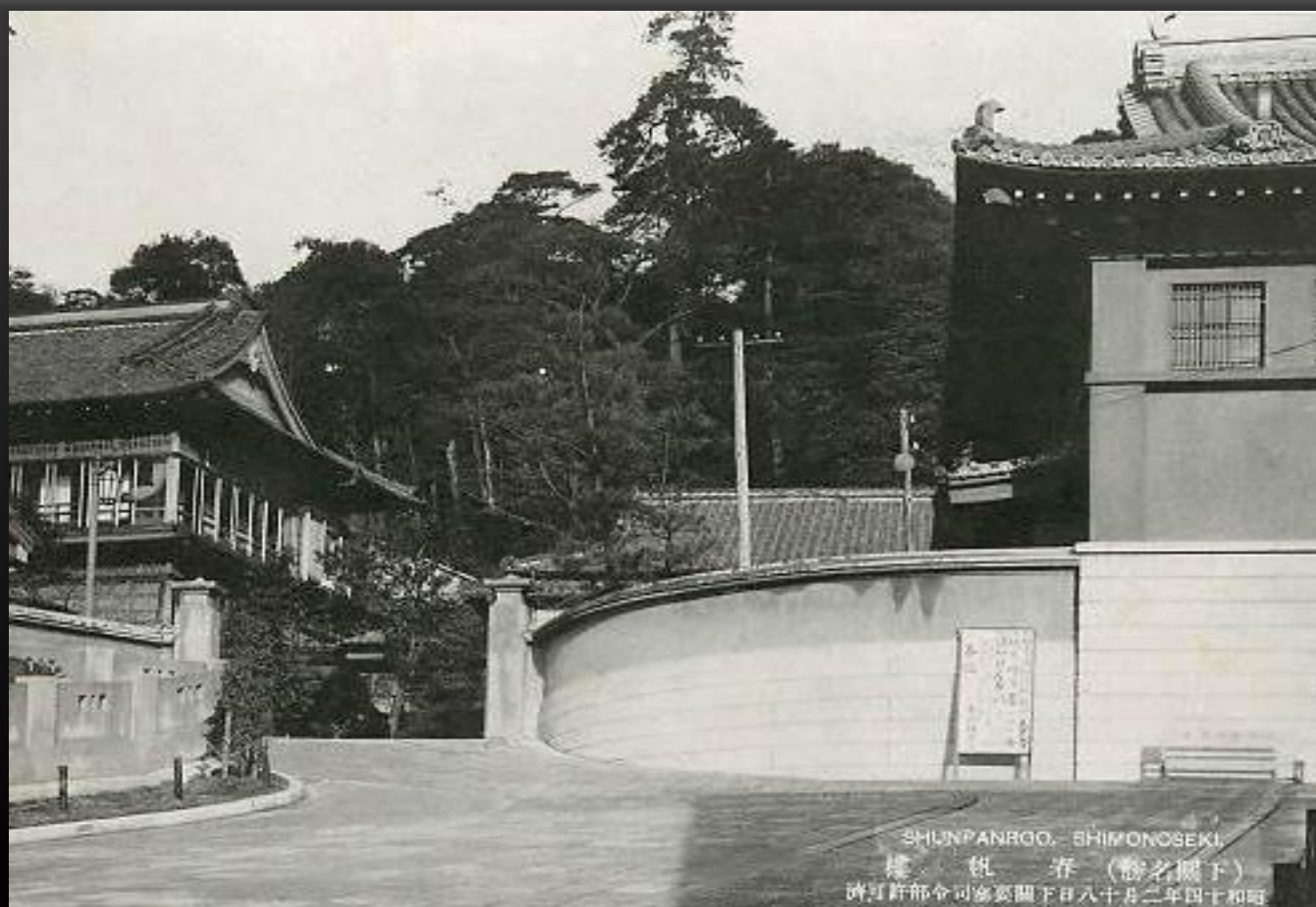
一c、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空襲脈絡

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戰略轟炸的主要目標是削弱日本後方工業與交通節點，特別是大城市工業區與關鍵港口，不少地方城市因所在區域被列入轟炸航路或港灣封鎖行動而遭受波及。〔綜合理解自同時期日本本土空襲的一般研究，現有春帆樓條目對具體作戰編號與日期並未詳載〕下關位處本州西端、面對關門海峽，本身是連接本州與九州、並通往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的航路、鐵路與物資集散要地，因此在戰略上具有一定重要性。在這樣的戰略環境下，下關市的市街、港灣設施與周邊工業基礎設施成為空襲潛在目標，春帆樓所在的阿彌陀寺町高台區域，則可能因鄰近市街或港區起火與延燒、亦或遭遇散布性炸彈與燃燒彈波及而被燒毀。現存公開中文資料多僅以「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因美軍空襲而燒毀」，並未提供具體的轟炸日期、參與部隊、投彈高度與精確目標指示等細節，顯示相關檔案尚未在華語學界形成細緻的個案研究。

一d、春帆樓焚毀的史料問題

目前可見的通行介紹而言，關於春帆樓的建築史與經營變遷相對清楚，例如由藤野玄洋家族創辦、1921年轉由林平四郎經營、1937年旁建日清議和紀念館，以及1985年主建物重建等時間點，都有明確記載。然而，對1945年前後空襲導致建物焚毀的記述基本停留在一句話的層次，顯然主要以旅館與紀念館方提供的年表性資訊為依據，缺乏來自美軍作戰紀錄或地方防空報告的交叉比對。這種史料結構導致一個現象，春帆樓在宏觀敘事中，被高度強調為「甲午戰後談判地」、「馬關條約締結地」，而其在戰爭末期作為城市建築、作為民用空間在空襲下的具體遭遇，反而被壓縮為象徵性的一筆。從記憶研究的角度來看，戰前「戰勝清朝」的國族記憶，與戰後「戰敗與焦土」的記憶，在此地的建築延續上形成強烈斷裂，前者被精心再現與展示，後者則以極簡方式被處理。

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空襲春帆樓的消失(二)



上圖：1945年美軍空襲下關區域春帆樓在燒毀前的外觀模樣。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一e、燒毀後的情況及發展

春帆樓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被美軍空襲燒毀」這一點，多是簡要一筆，對具體空襲經過本身著墨極少。在這種史料侷限下，只能從當時下關與本州西端沿岸城市所遭受的對日戰略轟炸脈絡，來對春帆樓焚毀的背景作較學術性的重構與分析。春帆樓作為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談判與簽署地點，是近代東亞國際秩序重組的重要舞台，在華語世界之所以知名，正是因為它與清朝戰敗、臺灣割讓以及朝鮮地位變動緊密相關。旅館地處下關市阿彌陀寺町，在赤間神宮旁的高台，可俯瞰關門海峽，這種「俯視海峽」的地理位置當年也被伊藤博文視為展示日本海軍力量與威懾清廷談判代表的象徵性空間。

甲午戰後，日本藉春帆樓這一場所，把戰勝清朝的記憶具體化、建築化：包括1937年在旁設立「日清講和紀念館」，重現會談場景、展示條約相關文物，將政治勝利轉化為可被反覆參觀與消費的歷史敘事資產，這種「記憶景觀」的塑造，使春帆樓在戰前日本國內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其作為一間地方割烹旅館的商業功能。

春帆樓1945年美軍空襲中燒毀後，並未立刻重建，原址並非僅留空地，而是逐步清理並維持基本使用狀態，美軍空襲後現場焦土，但因毗鄰1937年建成的日清講和紀念館（未毀），該館接管文物並暫管原址，文物移至鄰近日清講和紀念館重現二樓大廳場景，包括李鴻章座位與墨寶，供參觀者了解原始布局。避免完全荒廢；戰後「地產トーカー」公司迅速介入清理瓦礫，逐步復興經營，維持臨時營業。過渡至重建至1950年代初，原址設簡易攤位與紀念品銷售點，設簡易木造攤位繼續售賣河豚料理與紀念品，毗鄰日清講和紀念館作為輔助空間，避免土地閒置。因此非純空地，1950-1970年代，原址為臨時餐廳與停車場，逐步擴建小規模建物，至1980年代末全面重建為現代四層建築，保留歷史功能。1985年才全面重建為現代四層鋼筋混凝土樓宇。

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空襲春帆樓的消失(三)



2025年下關區域春帆樓的今貌,過去與現在因日清講和紀念館的感染下,彷彿看見惜日的影像。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f、空襲與戰後重建的象徵

1945年春帆樓原建物在空襲中焚毀後，下關市與營運者並未選擇完全放棄這一地點，而是在戰後數十年間先行局部修復、再到1985年完成現今主建物的新築，旁邊仍保留1937年建成的日清講和紀念館。這種「以新建物承載舊記憶、以戰前紀念館串接戰後空間」的配置，使春帆樓成為一個同時包含戰前帝國榮光敘事與戰後觀光都市、和解象徵的複合歷史場域。對今日的臺灣與華語遊客而言，前往下關參觀春帆樓與日清講和紀念館，多是為了回顧《馬關條約》下臺灣被割讓的歷史，而對1945年的空襲與焚毀經過則較少被主動呈現，這反映了地方觀光與記憶政治的取舍。

若從戰爭遺跡研究的角度切入，春帆樓本可被納入「被戰略轟炸摧毀的帝國象徵建築」這一類型，但目前相關學術化敘事仍明顯不足，為日後透過日本地方檔案、美軍戰時檔案與口述歷史補強留下重要研究空間。春帆樓被美軍空襲燒毀的經過，理解為：在一座擁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的條約簽署地建築身上，戰爭末期的城市空襲並非針對此象徵本身，而是將其作為整體軍事與交通節點的一部分而間接摧毀。然而，戰後記憶與重建的實踐，卻重新選擇了「恢復馬關條約舞台」這一面向，而未將空襲創傷的具體歷史過程同等地制度化、展示化，形成記憶上的偏重與沉默。戰時下關市政府與警防團資料、美軍第20航空隊或相關艦載機部隊的作戰報告、以及戰後地方報紙對春帆樓燒毀與重建的報導，因缺乏公開詳細嘅記載及細節，目前中文世界公開資訊不足的很多地方仍處於空白。

春帆樓原建物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遭受美軍空襲燒毀，但公開可得資料中缺乏具體空襲日期、參與機群或精確目標的細節記載。多數歷史記述僅概括為「1945年因美軍空襲燒毀」，將其置於下關作為本州西端港口與鐵路樞紐的戰略脈絡中。現有中文與日文通史資料一致指出焚毀發生於1945年太平洋戰爭後期，此時美軍已轉向對日本本土城市實施大規模戰略轟炸，包括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低空燃燒彈攻擊與艦載機掃蕩。下關位處關門海峽要衝，鄰近工業區與運輸設施，可能被納入1944年底至1945年夏的區域性空襲目標序列，但無證據顯示春帆樓本身為首要軍事目標，而是因市區延燒或散布性轟炸波及。美軍對下關的空襲重點在於摧毀港口、鐵道與周邊兵工廠，以切斷本州-九州-朝鮮的補給線，而非針對單一文化建築如春帆樓。阿彌陀寺町高台位置雖俯瞰海峽，卻緊鄰市街，易受火災蔓延影響；類似案例見於同時期廣島或小倉等西日本城市的無差別轟炸。缺乏美軍第20航空隊作戰日誌或下關防空報告的交叉驗證，導致無法確認具體飛行日期或投彈量。

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空襲春帆樓的消失(四)



上圖：美軍戰略轟炸門司港的範圍也是主要目標，現今有海上保安廳船隻駐守，遠處可見新春帆樓的位置（左方黃色頂建築物）。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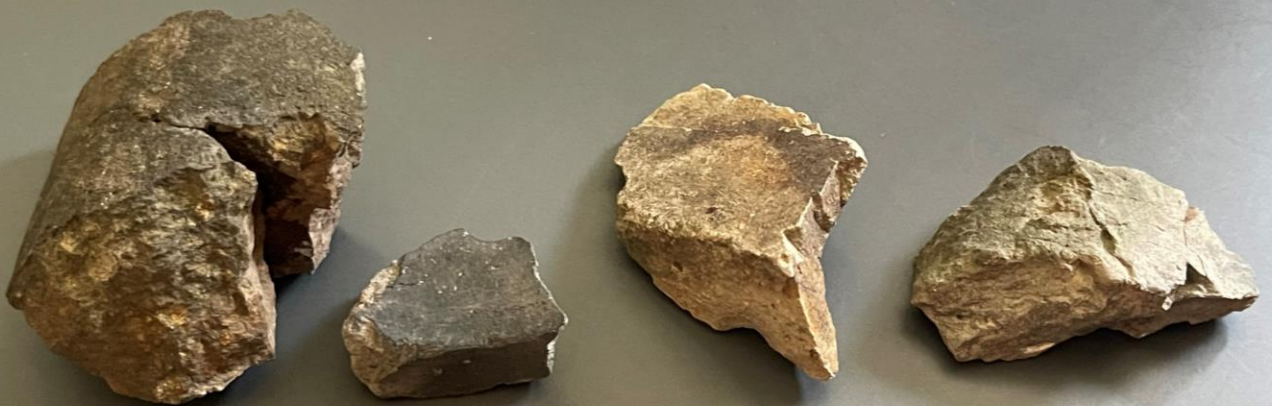
一g、史料缺口的學術意涵

這種資訊空白反映戰後日本地方檔案對民用損毀的記述偏重年表而非細節，華語世界則更強調春帆樓的甲午戰爭象徵，忽略戰末遭遇。欲補足需查閱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太平洋戰區轟炸紀錄或山口縣立圖書館的戰災報告，方能重建精準時序與損毀機制。下關春帆樓所在阿彌陀寺町區域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空襲中，主要因鄰近港口與鐵路設施而間接受波及，但公開資料未明確記載當日春帆樓附近特定軍事設施的損毀細節。

下關作為關門海峽要衝，擁有下關港灣（貨運與軍資轉運樞紐）、山陽本線鐵路終點站，以及周邊小型兵工廠與倉儲，這些為美軍B-29或艦載機的主要打擊對象。春帆樓高台位置距市中心港區約1-2公里，空襲常以燃燒彈覆蓋廣域，導致火勢蔓延至寺町區域，但無證據顯示附近有獨立軍事據點如炮台或機場直接受損。

鄰近設施推測損毀 下關站與鐵道作為本州西端鐵路樞紐，常遭轟炸斷絕九州補給，春帆樓以北約1.5公里，易受碎片或延燒影響。關門海峽航道設施：港灣碼頭與防空陣地為首要目標，空襲後火災常擴及高台民宅區。赤間神宮周邊：無軍事功能，但作為文化區隨市街一同焚毀，反映無差別轟炸特性。戰時下關防空報告多未公開細分民用損毀，春帆樓焚毀記述僅概括「市區空襲波及」，缺乏「當日」軍事設施對照表。需查閱山口縣戰災檔案或美軍第313轟炸機群紀錄，方能確認具體日期（如1945年3-6月序列）與鄰近目標損毀情形。

已消失在歷史的春帆樓遺構



上圖：下關日講和紀念館內所展示一幅春帆樓的繪畫。下圖：四件樸實無華的瓦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下関日清講和紀念館的瓦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春帆樓傍日清講和紀念館內展示的原有文物。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一h、日清講和紀念館

日清講和紀念館（又稱日媾和紀念館）位於日本山口縣下關市，紀念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簽署的《馬關條約》（日方稱下關條約）。該館為保存春帆樓（原簽約地點）中使用的桌椅、文書及相關文物而建，1935年動工，1937年6月完工開館，重現當時29天談判場景。建築為鋼筋混凝土一層樓結構，瓦頂，面積約138平方米，後於2011年登錄為日本有形文化財。1945年空襲倖存原因 1945年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空襲燒毀鄰近春帆樓，但紀念館未遭大火波及，文物完好保存至今。原因包括鋼筋混凝土結構耐火，以及可能避開直接砲擊或文物事先移置保護。

一i、日清講和紀念館的現存談判文物

日清講和紀念館於1937年建成前，將春帆樓原簽約桌椅、文書等文物移置保存，避免1945年空襲損毀，館內至今重現談判場景。史料保存依賴鋼筋混凝土結構耐火及戰時文物轉移，無重大變化。日清講和紀念館內保存了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時春帆樓使用的原物文物，重現當時會議室場景。館內中央展示16張由濱離宮賜予的大小椅子、法國製暖爐、草花紋蒔繪硯箱及墨水瓶等，這些為日清雙方代表如伊藤博文、李鴻章實際使用之物。桌椅配置標註各代表座位與職稱，忠實還原29天談判氛圍。另收藏伊藤博文、李鴻章遺墨、《清日講和條約》樣本、會議照片及出席者肖像，重現歷史細節。這些文物於1937年館建成前從春帆樓移置，避免1945年空襲損毀，至今完好無缺。春帆樓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簽署的原址，一座位於日本下關市的著名河豚料理旅館。

日清講和紀念館建於1937年，專為保存春帆樓內簽約時使用的桌椅、文書及文物而設，重現29天談判場景。原春帆樓後因地震及1945年美軍空襲燒毀，文物移至紀念館保存，現今春帆樓為重建後的旅館。兩者相鄰，均位於山口縣下關市阿彌陀寺町，春帆樓位置僅數十米之隔，紀念館建於春帆樓旁。春帆樓原建築於1945年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空襲中燒毀，此後經歷多次重建，成為當今河豚料理旅館。在毀壞與初步重建方面，原春帆樓在1895年簽署《馬關條約》後持續經營至1921年易主林平四郎，戰爭結束後由「地產トークン」接手重建並重新開業，恢復割烹旅館功能。1958年關門海底隧道開通後，昭和天皇與皇后曾駐蹕春帆樓，1963年國民體育大會期間再度獲日本皇室光臨。1985年12月進行全面改建，成為現今主要建物，2001年內部裝修，後轉由歐力士集團子公司經營。

下關春帆樓的日清講和紀念碑



上圖：碑文記述春帆樓地理與歷史沿革，重點紀念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過程，並記錄大正十二年（1923年）的史蹟。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一j、春帆樓講和紀念碑

下關春帆樓講和紀念碑建立於1923年（大正12年，癸亥孟夏），由馬關條約談判日方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巳代治撰文並刻於青銅碑上，旨在紀念春帆樓由廢棄到重建的過程，並永存甲午戰爭後的歷史意義。甲午戰爭（1894-1895）日本獲勝，清廷敗北後派李鴻章至下關春帆樓與伊藤博文談判，歷29天簽訂《馬關條約》，春帆樓因此名聞天下。1920年（大正9年）春帆樓主人病歿，建築瀕臨廢棄，地方人士林兵四郎（或林平四郎）出資購置保存，伊東受託撰碑記述樓宇由阿彌陀寺舊址改醫院再成客館的沿革及條約簽訂事蹟。碑文立於春帆樓旁強化其史蹟地位，後續1937年日本政府建「日清講和紀念館」旁邊，重現談判場景並保存文物，1945年空襲毀春帆樓時文物散失。2011年紀念館列為日本登錄有形文化財，碑文成研究馬關條約的重要一手資料。碑文彰顯日本視甲午戰爭為「國威濫觴」，炫耀軍事勝利與談判優勢，同時記錄地方保護文化遺產的義舉，對中日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研究具參考價值。

下關春帆樓的講和紀念碑（日清講和紀念碑）碑文由伊東巳代治撰寫，全文以文言文刻成，以下為完整內容：

「講和」邦彥王（碑額） 碑文全文：

馬關海峽為內海咽喉，以二條水道通玄海洋內外，船舶徂徠者無不過此，古有臨海館，今有春帆樓，共為待遠客之所云。樓負山面海，東仰壽永陵，西俯瞰街衢，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令人不遑應接。聞樓之所在，原係阿彌陀寺之墟，豐前人藤野玄洋，獲方四百步之地而開醫院。其歿後，寡婦某營客館，縉紳多投于此。甲午之役，六師連勝，清廷震駭，急遽請弭兵，翌年三月遣李鴻章至馬關。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樽俎折衝，以此樓為會見所，予亦從伯參機務。四月講和條約初成，而樓名喧傳于世。大正九年樓主病歿，其業將廢，馬關人林兵四郎投資購之，囑予記之。嗚呼今日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此地亦儼為一史蹟，其保存豈可附忽諸乎，林氏之此義舉，固宜矣顧當時，彼我折衝諸賢前後，皆易簣老軀獨存，是所以予以，不文敢草此記也。癸亥孟夏 從二位勳一等伯爵 伊東巳代治 撰拜書。

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



上圖：昭和12年(1937年)6月建立的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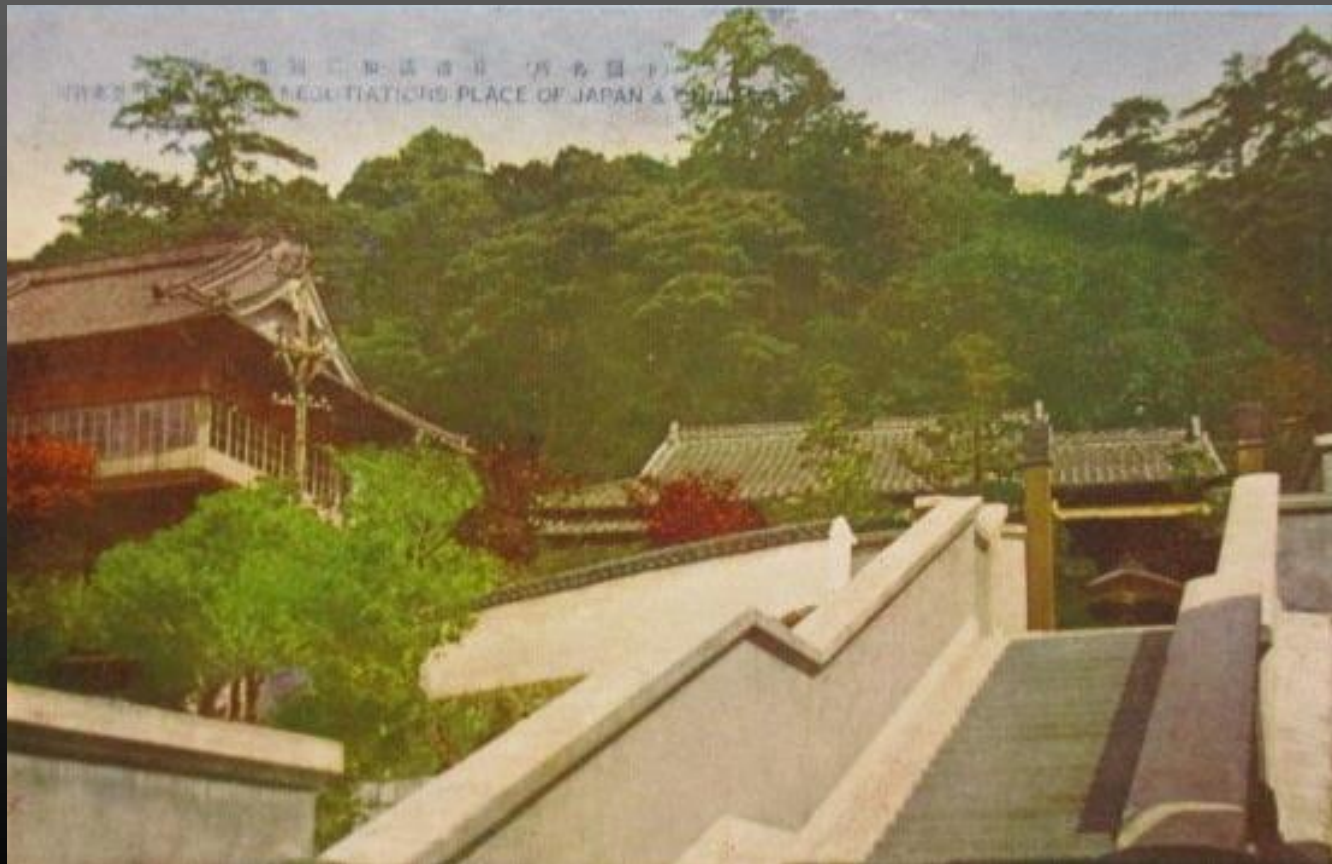
一k、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

關春帆樓園內的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建立於1937年（昭和12年6月），與日清講和紀念館同時落成。日本政府為紀念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40週年，在春帆樓旁興建紀念館並豎立銅像，表彰伊藤博文（時任首相、日方全權代表）及陸奧宗光（外務大臣）在甲午戰爭後談判中的「功績」，彰顯日本軍事勝利與外交優勢。

銅像強化春帆樓作為「日清講和」史蹟的象徵地位，配合碑文及紀念館，形成完整紀念空間，日本內閣及山口縣地方當局共同倡導此項目，作為日本國家層級的歷史紀念工程，配合春帆樓重建及碑文豎立，形成完整史蹟群。官方文件顯示，此舉屬昭和時期軍國主義宣傳一部分，表彰兩人在甲午戰爭談判的角色下關春帆樓園內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銅像的設置由日本政府官方決議推動，主要源自1937年（昭和12年）為紀念馬關條約簽訂40週年而興建日清講和紀念館的整體計劃。

日本內閣及山口縣地方當局共同倡導此項目，作為國家層級的歷史紀念工程，配合春帆樓重建及碑文豎立，形成完整史蹟群。官方文件顯示，此舉屬昭和時期軍國主義宣傳一部分，表彰兩人在甲午戰爭談判的角色。







〔内部全記〕 馬關春帆樓舊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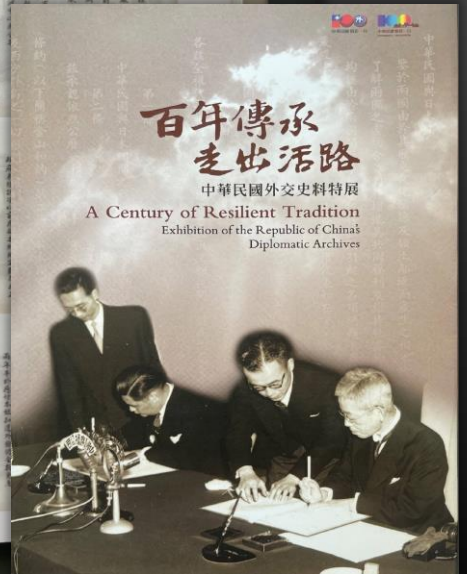


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定



上圖：抵達門司港後隔岸遠觀便可以見到春帆樓。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1895年簽定的馬關條約



上圖：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的1895年簽定的馬關條約。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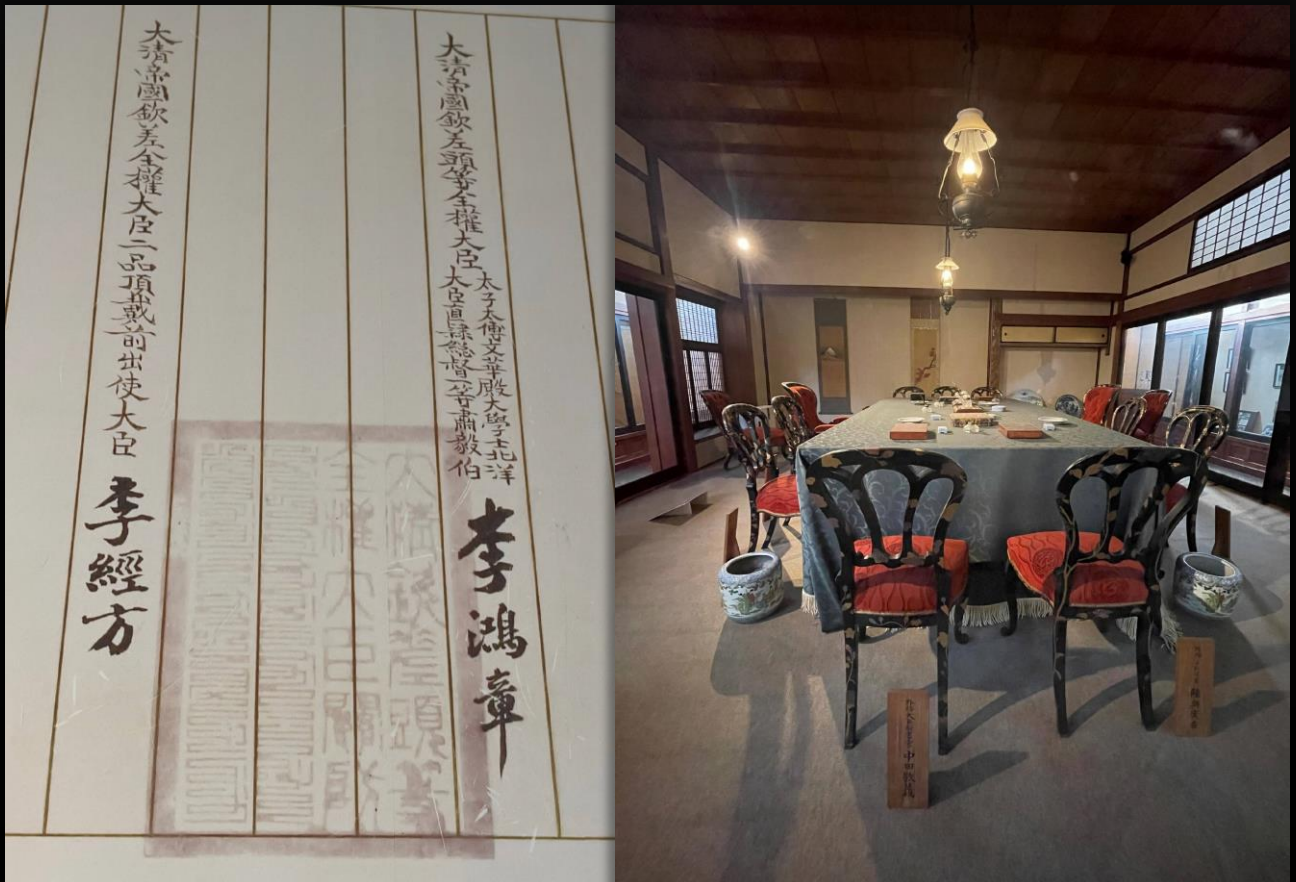
1895年有關《馬關條約》的重點條款

二、1895年有關《馬關條約》的重點條款

馬關條約全稱《馬關條約》（日文：下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於日本山口縣下關（馬關）春帆樓簽訂，由清廷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與日本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議定，經光緒帝批准後生效。甲午戰爭（1894-1895）清軍全面敗北，北洋水師覆滅，李鴻章於高升號船上被日軍刺傷後赴下關議和。條約簽訂後引發公眾義憤，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反對割臺賠款。有關賠償條款如第四條為最屈辱內容：清賠日本軍費二億兩庫平銀（白銀，約合3億日圓或清四年財政收入），分8年繳清—前兩年各5000萬兩，其後六年每年3000萬兩，加5%利息。實際總額達2.3億兩，導致清廷財政崩潰，發行外債並加重百姓稅負。有關領土割讓細節，第二條規定割讓遼東半島（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另賠3000萬兩）、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予日本「永遠讓與」。台灣居民抗拒，劉永福黑旗軍抵抗，交接時李經方於基隆外海完成儀式，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有關通商與特權擴張在第三條：開放重慶、蘇州、杭州、沙市為通商口岸，日本可設廠、進口機器、內河航行。及第六條：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獲清廷治外法權擴大。有關其他軍事與政治條款，如第一條：清承認朝鮮「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終止宗主關係。第五條：日本暫佔威海衛及膠州灣，直至賠款完清。及第七條：清允日本招募勞工赴日，拆除大沽炮台。

二a、《馬關條約》對清朝的財政打擊

馬關條約巨額賠款導致清廷財政崩潰，總額達2.3億兩白銀（含贖遼費及利息），相當於清政府3-4年財政收入，迫使採取多項緊急應對措施。清政府首先大舉外債，向俄法聯貸4億法郎（約1.6億兩銀），以海關稅及鹽稅作擔保，償還期36年，利息高達4-5%；後續又向英德美等借款，總債務超原賠款額兩倍，利息支出成新負擔。內部措施包括加徵鹽稅（每斤加價）、重抽煙酒稅、米折減成、裁減旗兵俸餉及勇營、扣減官員薪金，各地厘金改抽，導致民怨沸騰，引發義和團運動等動亂。加速洋務企業私有化（如輪船招商局部分股權售外）、發行外債修建鐵路（權利抵押列強），白銀外流致通貨緊縮，市場蕭條，資本積累停滯，直至辛亥革命仍未擺脫債務泥沼。



上圖：下關日講和紀念館內所展示的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的頁面位置內容。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大清北洋大臣李鴻章



上圖：大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典型的官式照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Li Hung Chang Memorial — Shanghai.



上圖：清代李鴻章銅像明信片（藏品編號：NGMH-QD-0012）。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三、北洋大臣李鴻章

上圖：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親筆簽名。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清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生於1823年安徽合肥，卒於1901年北京，字子黻、號少荃。早年李鴻章道光丁未科進士出身，早年投效曾國藩門下，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62年創建淮軍，迅速擴張至六萬餘人，裝備西方新式武器，成為清軍精銳。其後成為大清北洋大臣，於1870年起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權25年，主持洋務運動。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礦務局、唐胥鐵路，並建北洋水師，成為亞洲最強海軍。在他領導下的主要戰爭與外交，如中法戰爭後強化海防，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遭譏賣國。1900年義和團運動，任全權大臣簽《辛丑條約》。

李鴻章作為晚清重臣，其歷史評價在當代視角下呈現複雜二元性，既被視為洋務運動先驅，也飽受賣國指責。他創建淮軍平定太平天國，主持洋務自強，開辦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及北洋水師，奠定中國近代工業與海防基礎。外交上靈活運用「以夷制夷」，如天津教案與中法和議，避免更大戰禍，獲譽中興名臣。甲午戰敗簽《馬關條約》割臺賠款，義和團後議《辛丑條約》，被斥賣國賊，改革僅限皮毛未觸政體根本。然近年研究認其受制中央腐敗與國力懸殊，非個人全責。當代視角，今日史學多視李鴻章為時代產物，在內憂外患中求存圖強，雖妥協求和但推動現代化轉型，其功過需置於清末大勢考量。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對李鴻章的外交手腕高度肯定，稱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視為中國近百年僅有的兩個半外交家之一。他認為李鴻章在晚清內憂外患中，以靈巧外交周旋列強，如天津教案、中法和議及三國干涉還遼，避免更大災禍，堪稱偉大外交家。此觀點強調李非賣國，而是受制國力，求存圖強。近年史學未見明顯改變，唐德剛視角仍獲認同，多視李為時代悲劇英雄，洋務貢獻與外交務實勝過傳統譴責，毀譽參半但功大於過。



上圖：春帆樓傍日清講和紀念館內李鴻章的座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引接寺山門在1945年美軍空襲幸存，下圖：春帆樓講和紀念館收藏李氏下榻引接寺時使用的屏風。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下榻引接寺與李鴻章遇刺

三a、引接寺

李鴻章於1895年3月19日抵達日本下關，參與馬關條約談判，為避免安全問題，他最初兩天住在船上，直至3月21日才入住引接寺作為宿舍。李鴻章每日乘轎往返春帆樓談判地點與引接寺，期間多次會談但進展緩慢。日本提供寺內住宿，但李氏堅持不食日方餐食，以防中毒，僅食用隨行廚師準備的清式菜餚。寺內環境簡樸，他常在病房或客室休息，談判無果時則在此商議策略。引接寺於1895年接待李鴻章入住時，作為淨土宗寺廟，其住宿環境屬傳統日本寺院格局，簡樸實用，主要利用客殿或僧房改作臨時宿舍。寺院位於下關市高山町山麓，建於1560年，周邊為靜謐山區小徑，寺內庭院寬敞但無奢華裝飾。李鴻章一行約數十人入住，寺方提供清掃與基本設施，日本政府補助經費確保整潔，但清方隨從嚴守飲食與衛生，自備炊具與床鋪，避免依賴日方。李鴻章本人住單獨客室，格局為日式和室約6-8疊，榻榻米大小，推拉紙門隔開，內有矮桌、蒲團與簡易屏風，槍傷後，此室改為病房，置醫藥箱與休憩榻。隨從分住左右連通僧舍，每室4-6人，格局類似長方形連房，通往走廊與中庭，無獨立衛浴，全賴公共井水與簡易廁所。房間採光依賴紙窗，夜晚點油燈照明，槍擊事件後寺內加強警衛，門前設轎子停放區。李鴻章常於室內會客，商討條約策略，環境雖清幽但談判壓力大，僅供短暫休憩。

三b、行刺事件詳情

1895年3月24日下午4時15分，第三輪談判結束後，李鴻章乘轎沿山下大路返回引接寺，距寺門不遠處，22歲無業青年小山豐太郎（群馬縣出身）突然從人群衝出，近距離開槍擊中李左眼下方，子彈嵌入臉頰，造成嚴重出血與暈眩。李鴻章被隨從護送回寺緊急治療，傷勢雖非致命但需休養約兩週，期間引接寺成為臨時病房，下關市民送上魚缸內的海鮮作為慰問，盼其早癒。槍擊事件震驚國際，日本為挽回形象同意清方停戰要求，並讓李鴻章改走春帆樓至引接寺的山麓小徑（後稱「李鴻章道」，長約數百米、寬1.5米），避開人群。4月10日談判恢復，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小山被判無期徒刑。

李鴻章1895年下關遇刺後，清朝國內輿論呈現強烈憤怒與分裂，視事件為日本野蠻行徑，同時加劇對李氏議和政策的攻擊。官方與朝野反應清廷震驚，光緒帝與慈禧迅速發電報慰問李鴻章，並暫停談判要求日本道歉與賠償，朝中主戰派如康有為借機上書，主張廢除議和、繼續作戰，以報復日本「不顧信義」。報章如《申報》刊載消息，激起民間義憤，許多士紳呼籲「雪恥」，但基於戰敗現實，官方仍以保護李氏安全為先。對李鴻章的批評輿論中，主和派支持李氏堅忍，但保守派與激進分子譏其「賣國賊」，指責議和條件過苛、未能預防刺殺，甚至傳言李氏「借傷要脅朝廷讓步」。事件雖助談判獲停戰與減賠，但強化了後世對李鴻章「漢賊」的負面形象，維新派則視為日本恃強欺弱的證據。



上圖：李鴻章遇刺後改用小路往來引接寺往返春帆樓，也是為人熟悉的李鴻章道。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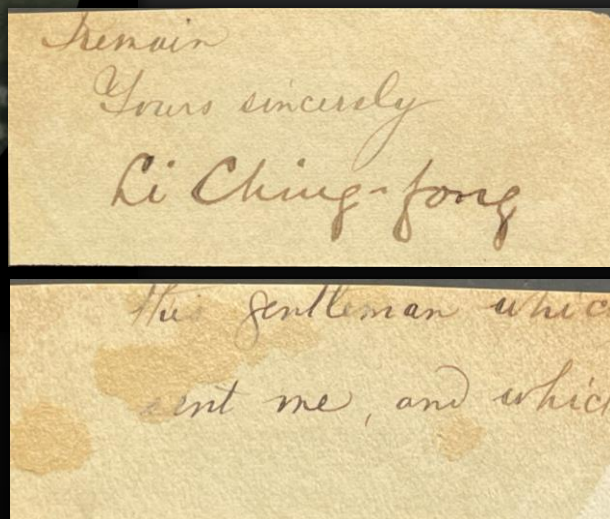
上圖：李鴻章乘轎返回引接寺，距寺門不遠處22歲無業青年小山豐太郎(下圖左方人像)從人群衝出，近距離向李氏開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李鴻章遇刺後在引接寺休養時的照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大清馬關係約簽署代表李經方



上圖：清·李經方手簽（英文剪片）（藏品編號：NGMH-QD-0085）。這張剪片的英文內容為：“The gentleman which sent me, and which” 翻譯成中文是：「那位先生派我來，而且」。^[附件] 請注意，剪片上方因有污漬和文字缺損，可能不是完整句子，這只是目前能辨識的全部內容。另一片這張剪片上的英文內容為：Remain Yours sincerely Li Ching-fong 翻譯成中文是：敬啟者謹上 李經方。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三c、晚清民初的外交家李經方

李經方是晚清至民初的重要外交官與實業家，同時是李鴻章的養子與主要助手之一。李經方生於1855年，安徽合肥縣磨店人，字伯行，號端甫。本為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同治元年（1862）因李鴻章年逾不育而被過繼為長子，自幼受李氏家學與洋務思路影響甚深。科舉與仕途起步，他在府學為廩生，被列為候選郎中，1882年在江南鄉試中舉，成為仕途後備人才。此後歷任分省補用知府、補用道、軍機處記名官等職，逐步進入中央決策與對外交涉圈層。洋務與出使活動李經方早年即隨李鴻章參與洋務事務，積累對近代外交與財政的實務經驗。

光緒十六年前後，他以候補道銜出使日本大臣，其後又出使英國，並曾任駐倫敦使館負責人與郵傳部左侍郎，成為晚清少數熟悉多國交涉的官員之一，1895年中日戰後，他作為李鴻章代表之一，在下關春帆樓參與《馬關條約》簽署，因而在史書中多與割臺事件相連。同年6月2日，他又以清廷全權代表身分，在基隆外海與日本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完成臺灣與澎湖的實際交割手續。清末他曾著有《安徽全省鐵路圖說》，反映其對近代交通與地方開發的關注，也涉足企業與鐵路等實業經營。民國成立後，他基本退出政壇，轉向經濟、實業與家務經營，1934年在大連去世，享年約80歲，成為見證清帝國覆亡與民國建立的一代外交老臣。



上圖：春帆樓傍日清講和紀念館內李經方的座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伍廷芳



上圖：清代伍廷芳手簽三(名片) 伍廷芳 JP (1842/1922年) 本名敘，字文爵又名伍才，號秩庸、齋號，祖籍廣東新會，生於南洋的英屬馬六甲。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書法家。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為香港早期華人精英，也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議員。其後於中國從政，是近代有名的政治家，北洋大臣李鴻章幕僚，民國元年任中華民國外交總長 館藏類別：紙質 年代：尺寸:6.8cm X 10.3cm 附註：手簽/中英文簽名。(藏品編號:NGMH-QD-0018)。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三d、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伍廷芳

伍廷芳是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律師和政治家，祖籍廣東新會，生於1828年新加坡（時屬馬六甲），卒於1922年廣州。十四歲移居香港，就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任高等審判庭翻譯，並創辦中國最早中文報紙《中外新報》。1874年自費赴英留學倫敦大學學院，1877年獲法律博士及英國首位華人大律師資格，回港後任首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反對歧視華人政策。1896年起任駐美公使，抗議排華法案並簽訂中秘條約，後任法部大臣，主持修訂刑律，廢除凌遲等酷刑，建立現代刑法基礎。

1902年與沈家本改造《大清現行刑律》，被譽為中國刑法開新紀元。1911年支持辛亥革命，任南北議和南方代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後追隨孫中山，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及廣東省長，一度代行非常大總統，1922年病逝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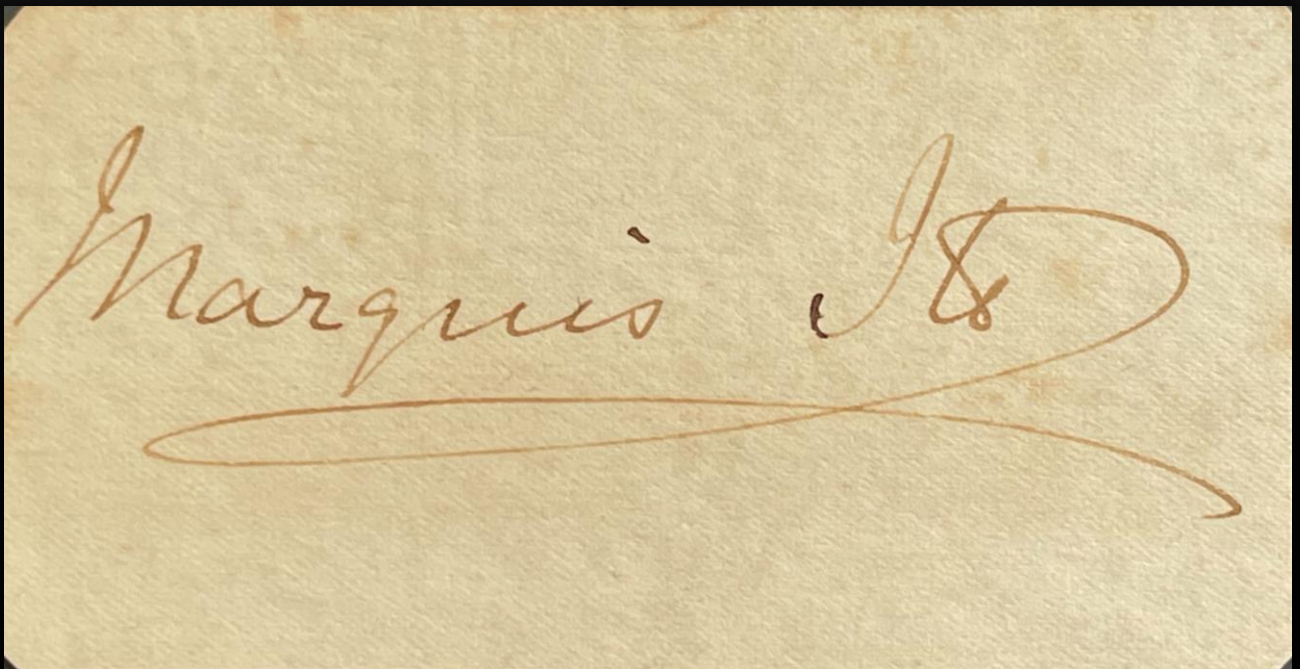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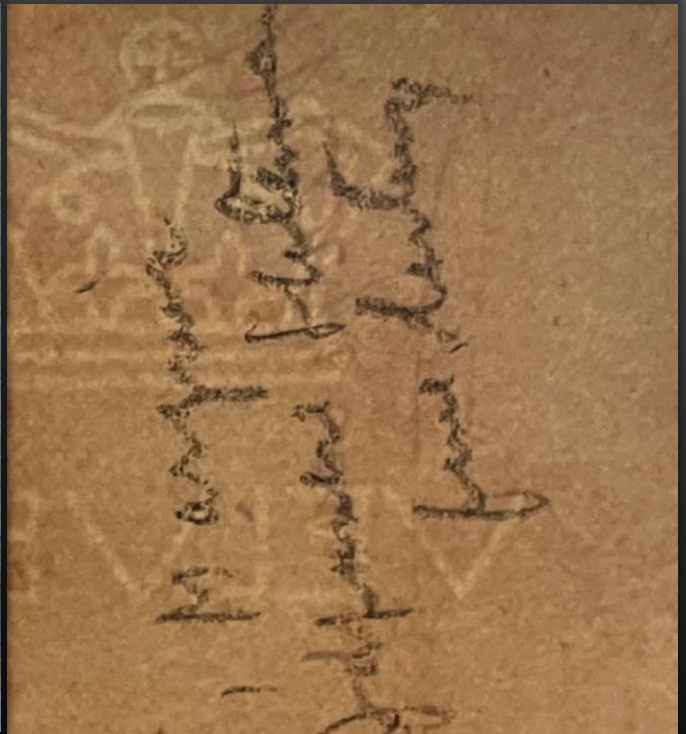
上圖：春帆樓傍日清講和紀念館內伍廷芳的座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日製甲午紀念印刷畫(春帆樓會議) (藏品編號:NGMH-JP-0037)。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日本帝國首相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英文手簽（藏品編號:NGMH-JP-0014）。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三e、第一任日本首相總理大臣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時代的關鍵政治家，明治維新元老之一。1841年生於長州藩農民家庭，原名伊藤俊輔，早年入吉田松陰松下村塾學習。1863年作為長州五傑之一偷渡英國留學，見識西方國力後轉向開國倒幕，參與明治維新。維新後任兵庫縣知事、工部卿，1871年參與岩倉使節團歐美視察。1885年廢太政官制，創內閣制，任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前後四度組閣，推動近代化改革。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奠定君主立憲基礎。策劃甲午戰爭勝利，促成《馬關條約》，後任韓國統監，擴張日本在朝鮮影響力。晚年與遇刺，1909年10月在哈爾濱火車站，被韓國獨立運動者安重根刺殺，伊藤享年68歲。

春帆樓傍日清講和紀念館內伊藤博文的座位



上圖：春帆樓傍日清講和紀念館內伊藤博文的座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



上圖：日製的甲午戰爭紀念瓷。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定遠館經過修整後，結構多以複製件替代，但門閘卻是其著名的地標性文物。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甲午戰役後建造的定遠館

四、小野隆助建的定遠館

定遠館是由清國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的殘骸部材，在日清戰爭後運到太宰府所興建的一座小型紀念館，目前仍存於太宰府天滿宮境內附近，外觀低調，未作大型觀光開發，但作為甲午戰爭與近代日中關係的物證，保護與活用的討論正逐漸增加。甲午戰爭後由小野隆助打撈、建館日清戰爭後，出身太宰府、曾任福岡縣知事、且是太宰府天滿宮神職與眾議院議員的小野隆助，向日軍大本營申請打撈「定遠」殘骸，1896年3月獲准，以民間經費進行打撈，小野約用一年時間拆運艦體部件回九州，在太宰府天滿宮附近自宅敷地內，以艦材興建一座別墅式建物，命名為「定遠館」，有強烈「紀念戰勝、向明治天皇表忠」色彩，也被視為他企圖洗刷福岡藩幕末以來「不忠、不協調」形象的一種象徵行動。

小野隆助出身太宰府、曾任福岡縣知事、且是太宰府天滿宮神職與眾議院議員的小野隆助，向大本營申請打撈「定遠」殘骸，1896年3月獲准，以民間經費進行打撈。小野約用一年時間拆運艦體部件回九州，在太宰府天滿宮附近自宅敷地內，以艦材興建一座別墅式建物，命名為「定遠館」，有強烈「紀念戰勝、向明治天皇表忠」色彩，也被視為他企圖洗刷福岡藩幕末以來「不忠、不協調」形象的一種象徵行動。以艦材再利用的具體例子，緣側下方的橫桿等部材，部分其實是「定遠」救生艇的木槳，切削後嵌入建築結構，可見半圓與扁平截面並列的特殊形狀。大門門扉使用裝甲鋼板，表面仍保留海戰中砲彈炸裂留下的洞孔與破片痕跡，成為最具視覺衝擊的「戰爭痕跡」展示。

院內與屋內局部構件（欄杆、金屬配件等）亦可辨識為艦上部件的再利用，呈現近代軍事物資被「日常住宅化」的特殊歷史過程。定遠館目前仍在原址保存，屬太宰府天滿宮所有，外觀維持傳統木造日式住宅樣貌，正門附近立有解說牌，簡述「威海衛海戰、定遠自沈、打撈建館」等來歷。有報導指出建物近年進行修繕，部分建材已更換新材以確保結構安全，但仍盡量保留原本來自「定遠」的部件與布置方式。多數旅遊與歷史遊記強調，定遠館位於天滿宮觀光動線旁邊，但並非大型博物館或主力景點，通常只能在外圍庭院門口觀察，內部並非長期全面對一般遊客開放。從中文與日文遊記來看，關注者多是研究甲午戰爭、海軍史或東亞近代史的訪客，普通觀光客往往甚至不知道這處遺構存在，顯示其知名度與展示力道相對有限。建物本身屬於明治後期的木造住宅，老化與耐震、安全性是實際的保存課題，如何在維修換材與保留「定遠原件」之間取得平衡，將直接影響其原真性與展示力。由於定遠館兼具「日本戰勝紀念」「清國戰敗象徵」與「跨國記憶遺產」等多重意義，未來如何用更中立、歷史性的語言來解說，讓中日韓等地訪客都能理解其複雜性，而非單一國族視角，將是詮釋上的重要方向。



上圖：定遠館經過修整後，其結構多以複製件替代，觀察其外觀沒真多少原件，估計是保護性收藏需要。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從這角度觀看定遠館門閘有著東洋風情畫,但懂得這文物歷史的人卻不太多。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上圖：福岡縣定遠館外觀。下圖：定遠館以救生艇的木槳，切削後嵌入建築結構內作為建構。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延陵科學綜合室收藏的定遠艦



上圖：銅鐘直徑約15.5cm、鐘高12cm，重1327克的定遠艦訊號鐘。右圖：水龍頭輪閘被大海的泥砂侵蝕，銅閘直徑約為9.5cm、閘厚1.6cm，重513克。中央位置：清朝的國旗黃龍旗（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在形態上確實威武且具有皇家象徵意義。黃龍旗起初為清朝政府及海軍船隻所用。圖下方：2025年格物研究為本專題特別製作的定遠艦於1885年的塗裝色。下：1:350的定遠艦模型與它的訊號鐘擺放在一起。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四a、延陵科學綜合室收藏的定遠艦

定遠號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 (Stettiner Maschinenbau A.G. Vulcan) 於1881年簽署合同製造，主要為清朝北洋水師的旗艦。其建造地點在今日波蘭的什切青 (斯德丁 (Szczecin))。定遠號於1885年服役，成為遠東當時最大的戰艦之一，屬一等裝甲艦 (steel battleships) 被稱為“亞洲第一”。在甲午戰爭前，定遠號曾多次出訪俄羅斯、韓國、日本等地，顯示其強大的戰鬥力和戰略地位。定遠號主要性能為，排水量約7355噸、滿載排水量：約7360噸，全長94.5米，寬度：18米，吃水深度6米，最高航速14.5節，動力系統：搭載兩台復合橫置式蒸汽主機和8座燃煤鍋爐，續航能力約4,500海裡 (以10節速度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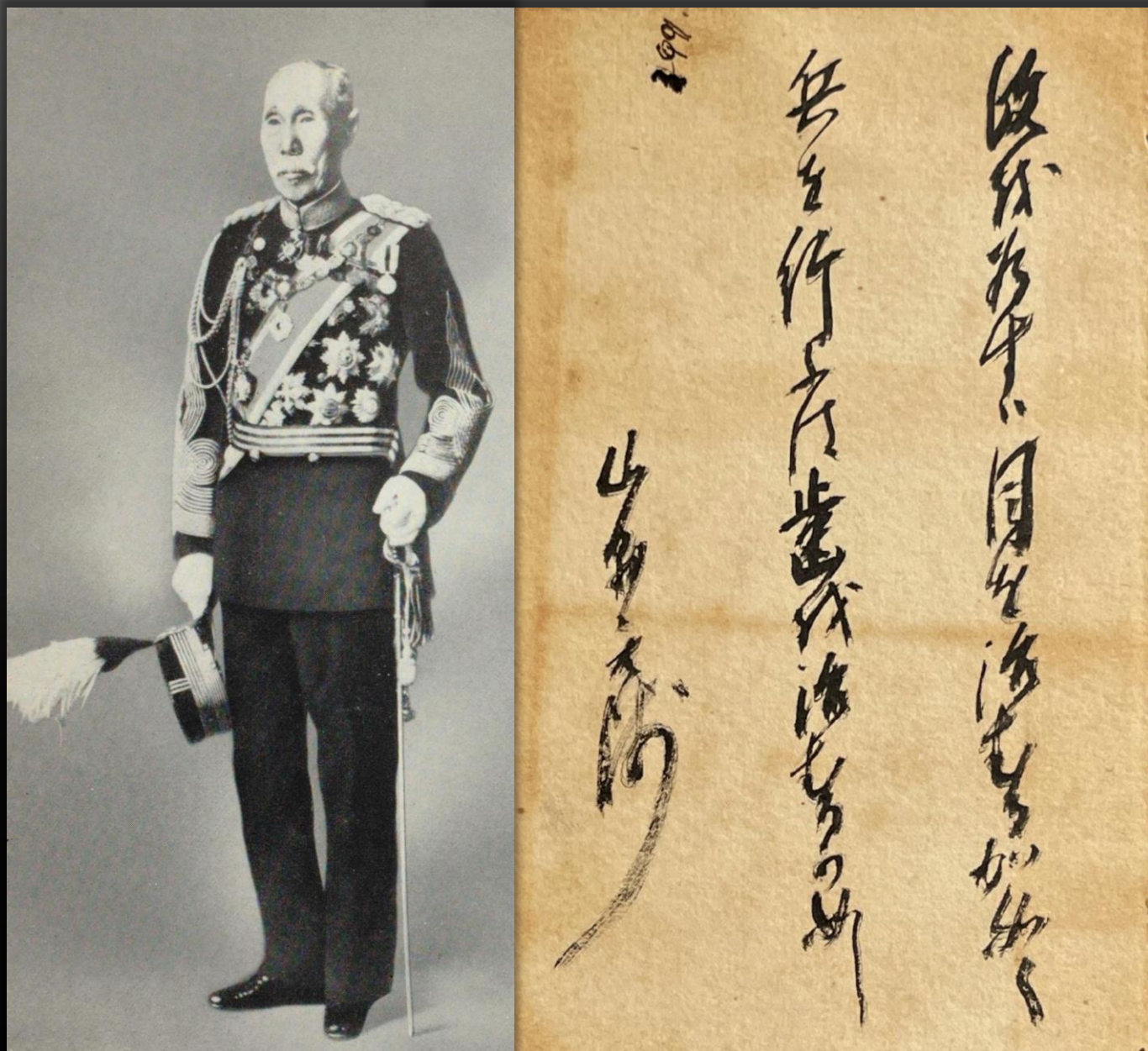
上圖：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手跡。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a、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

伊東祐亨在日清戰爭中擔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發揮了關鍵的海軍指揮作用。他於1894年7月接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專注於爭奪制海權，積極尋求與中國北洋艦隊的決戰。他率領聯合艦隊多次出擊，包括著名的黃海海戰，這場海戰中日本艦隊成功擊敗北洋艦隊，毀滅了清朝的主要海軍力量。

伊東祐亨指揮聯合艦隊支援日本陸軍攻占重要戰略據點如大連、旅順，並提出“海陸夾擊”的戰略建議，促成了對山東半島及威海衛的進攻計劃。最終，他率艦隊護送日軍登陸山東半島，配合攻占威海衛，徹底摧毀北洋海軍，為日本在陸戰和海戰雙線作戰中提供有力支援。伊東祐亨的海軍行動使日本獲得制海權，切斷了清軍的外援和撤退路線，對清軍陸戰形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成為日清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



上圖：日本帝國軍將帥山縣有朋手跡。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b、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在日清戰爭中扮演重要軍事領導角色，既是日本近代陸軍的奠基者，也是甲午戰爭主要指揮官之一。他於1894年親自上陣，任第一軍司令官，指揮日軍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多場重要陸戰，包括攻占平壤、跨過鴨綠江進入中國境內，連克九連城和丹東等地。山縣的軍事作戰指揮強調步步為營和兵力集中運用，其戰略有效配合日本海軍，實施海陸聯合作戰，確保陸戰物資和兵力順利前進。

他在戰事中不僅是軍事統帥，也是戰略決策核心，對日本軍隊的組織調度和戰場指揮影響深遠，山縣有朋在戰前就致力於日本陸軍的現代化建設，推動普魯士模式的軍事制度改革，增強了日本陸軍的戰鬥力，也為甲午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他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威望使他能在全局中施展影響力，成為甲午戰爭中極具代表性的日本將領。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第五師團長奧保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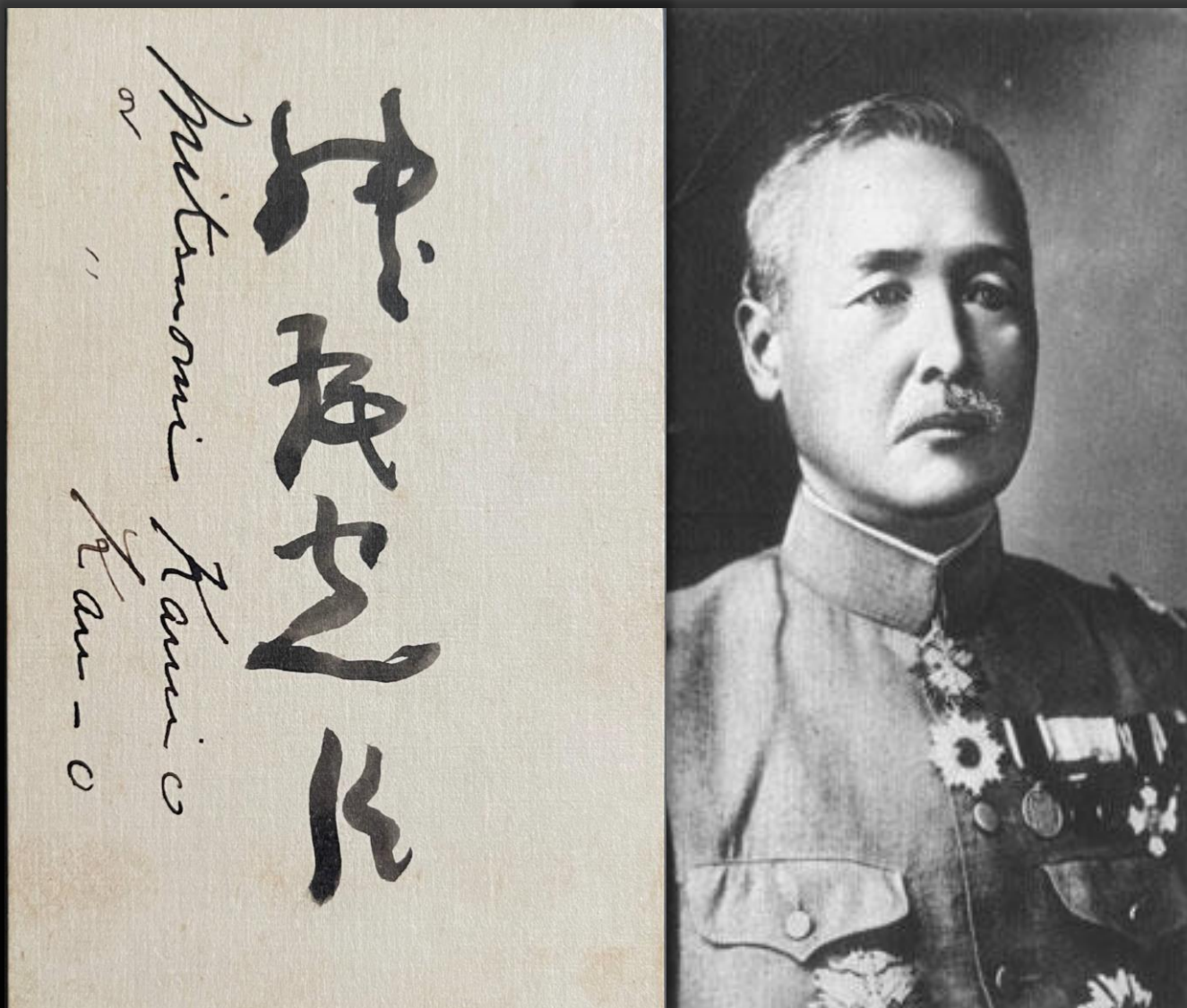
上圖：奧保鞏（1847-1930）明治時重臣，官居元帥陸軍大將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伯爵。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c、第五師團長奧保鞏

奧保鞏（日語：Oku Yasukata）是日本陸軍的重要將領，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中擔任第五師團長，負責率領部隊在陸上作戰。奧保鞏指揮第五師團參與了多場重要戰役，如平壤戰役和鴨綠江附近的戰鬥，成功突破清軍防線，協助日軍推進至中國東北腹地。他以勇猛果斷聞名，善於戰術指揮，戰時命令第五師團有效利用火力和兵力優勢，對清軍實施夾擊和壓制。

這些作戰行動對日本軍隊在甲午戰爭中取得陸地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奧保鞏日後於1907年晉升為伯爵，並官至元帥陸軍大將，是日本軍隊近代化和戰鬥力發展的重要人物之一。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日軍參謀神尾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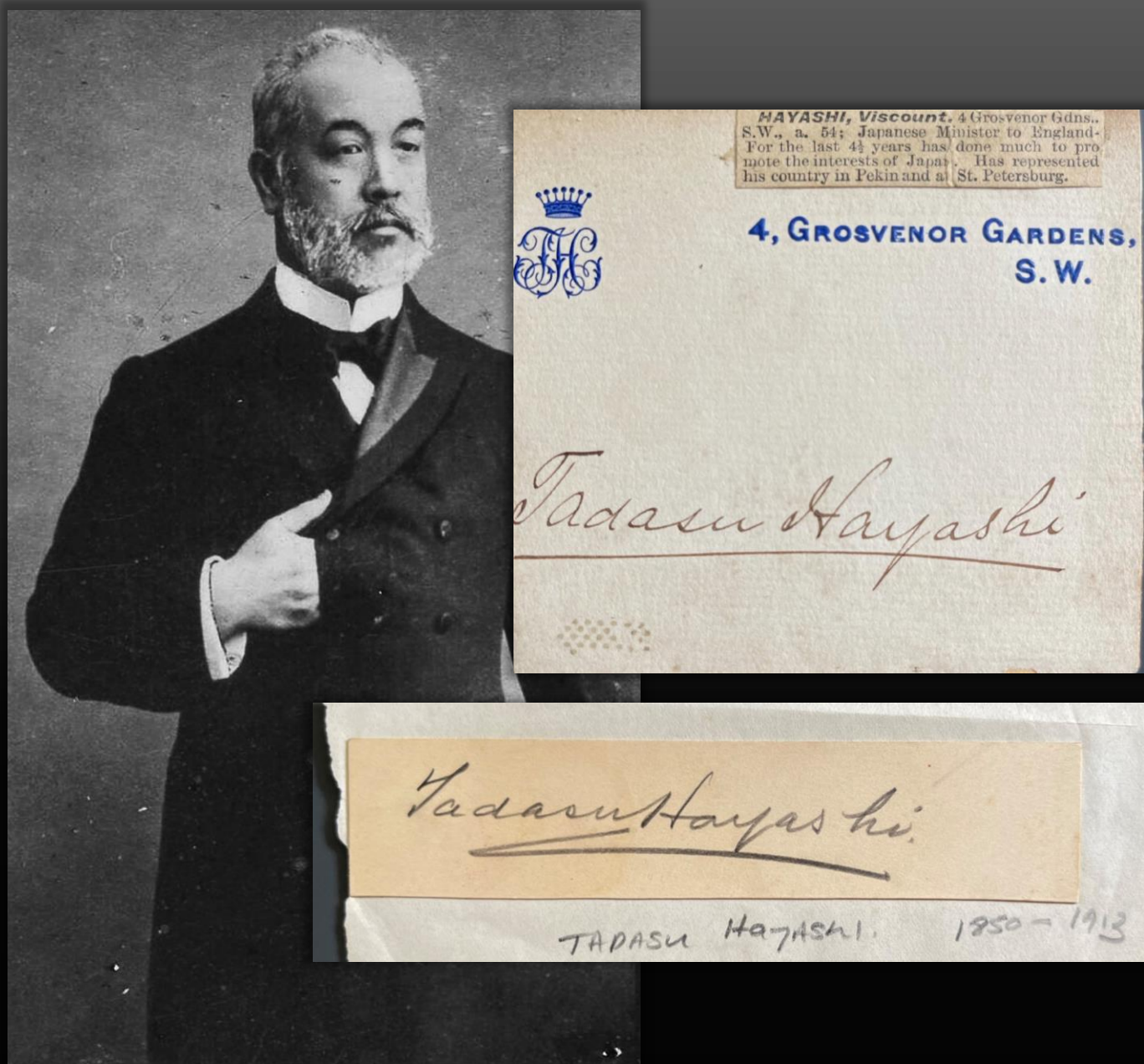
上圖：日本帝國軍將帥神尾光臣手簽（1890-1910年代）。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d、日軍參謀 神尾光臣

神尾光臣（日語：Kanemi Mitsuomi）在日清戰爭中主要擔任日軍參謀職務，參與戰略與作戰計劃的制定。他並非前線主將，但作為參謀在制定作戰計策、協調部隊行動和情報分析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神尾光臣協助日軍指揮官有效安排兵力部署及攻擊順序，促成日軍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多場陸戰勝利。他的策略支持了日軍實施快速機動和兵力集中，強化陸軍部隊的作戰效率。

神尾光臣對甲午戰爭中日軍得以迅速壓倒清軍，改變戰局有重要影響，間接促進了日本在戰爭中的整體勝利。神尾光臣主要在參謀角色中發揮重要作用，透過戰略策劃和作戰指導，強化了日軍陸戰實力和戰術運用，對甲午戰爭日軍勝利貢獻突出。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駐清日本公使林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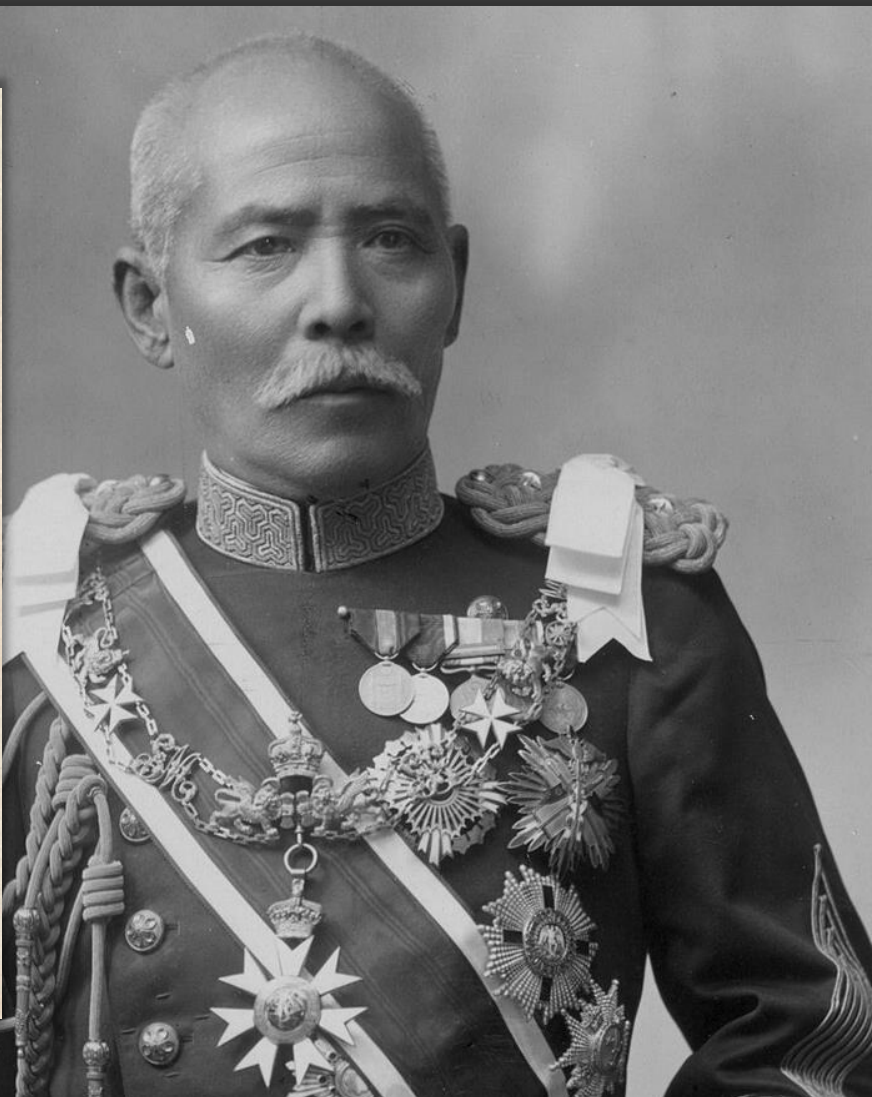
上圖：明治時期的外交官政治家 林董 手簽（英文 / 鉛筆）一（英文 / 鋼筆）二。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e、駐清日本公使林董

林董是指駐清日本公使林董（Hayashi Tadasu），在日清戰爭及其後的外交過程中發揮重要的外交作用。他並非軍事將領，而是日本駐華公使，主要任務是推動日本在清國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尤其是在馬關條約談判期間，林董作為日方重要外交代表之一，參與對清政府的談判與情報收集。

林董在戰爭中密切配合日本政府，監督和協助日本外交政策的執行，促使清朝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並加強日本在東亞的勢力擴張。他在甲午戰爭前後多次與清國官員接觸，協助日方掌握清朝內部矛盾和談判態度，為日本獲取戰爭勝利創造有利條件。林董在日清戰爭及戰後中，主要發揮外交策略和外交斡旋的作用，是日本成功運用外交手段配合軍事行動的重要人物。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日本第一軍司令官黑木為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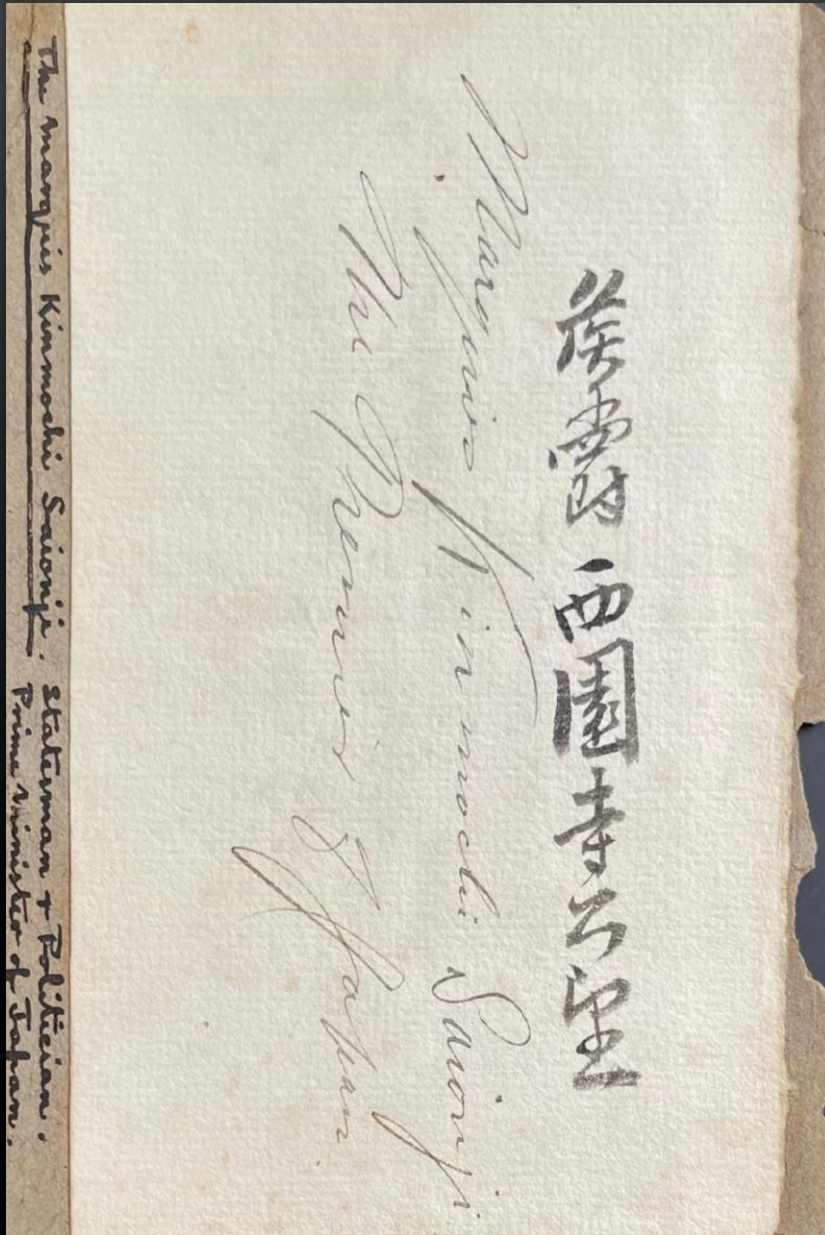


上圖：日本帝國軍將帥黑木為禎手簽。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f、日本第一軍司令官黑木為禎

黑木為禎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陸軍的重要將領，擔任日本第一軍司令官。他指揮第一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展開多場重要陸戰，尤其是平壤戰役中發揮關鍵作用，帶領日軍成功攻占平壤，迫使清軍退撤。黑木為禎以果敢和靈活的指揮聞名，善用兵力集中和機動戰術，在多場陸戰中取得戰果，推動日軍在甲午戰爭中的陸地優勢。他的指揮和作戰策略有助於日本陸軍迅速壓制清軍，有效配合海軍行動，為日本取得整體戰爭勝利作出重要貢獻。黑木為禎在威海衛之戰的指揮細節顯示，他在這場戰役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直接參與陸海聯合攻擊，指揮日軍對這塊戰略重鎮的攻占。

1895年，威海衛之戰是日清戰爭的轉折點之一，黑木為禎負責指揮陸軍部隊配合海軍行動，進行圍攻。黑木為禎率領的日本陸軍第一、第二軍，配合海軍對威海衛的守軍進行陸海攻擊。日軍在他的指揮下，逐步包圍清軍防線，利用炮戰和陸戰的協同作戰戰術，不斷壓縮清軍勢力範圍。具體作戰中，他指揮的部隊進行多次陸地攻防戰，包括對清軍陣地的突破和設置伏擊。最終，威海衛的清軍抵抗失敗，日軍成功佔領這一重要戰略據點，切斷了清朝在東北的海上通道，對戰局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黑木為禎在威海衛之戰中的作用主要是指揮陸軍與海軍聯合作戰，有效利用火力協同攻擊，最終協助日軍取得戰役勝利，並在戰略佈置和戰術運用上起到了關鍵角色。



上圖：日本明治時代/西園寺公望（1849-1940），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手簽。（藏品編號:NGMH-JP-0015）。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g、西園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在日清戰爭期間並未直接參與軍事行動，而是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官，主要在戰後的外交和內政中發揮影響力。當時他是明治時代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文部大臣和外務大臣，與伊藤博文等政界領袖密切合作。在日清戰爭期間，西園寺主要支持日本政府的外交戰略，促使日本在國際舞台上鞏固戰爭成果，並主張強化日本現代化建設，尤其是在教育和外交方面。他在戰後日本的內政外交中持續施加影響，推動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為日本後期擴張和崛起奠定基礎。西園寺公望在日清戰爭中屬於幕後政治力量，通過政治和外交手段間接促進日本戰爭的成功及戰後秩序的鞏固。日清戰爭期間，西園寺公望的官方職務是樞密顧問官兼賞勳局總裁（1894年5月10日任命）。後於8月20日被派往朝鮮擔任大使，負責監督朝鮮局勢及對日清戰爭的相關外交事務。他身兼貴族院副議長等政治職務，參與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的內政外交決策與協調。西園寺公望在戰爭爆發前後主要負責監督外交政策執行，以及協助處理朝鮮問題，為日本戰前戰中提供實地情報與外交支持。其政治地位令他能在戰爭策略及和議談判中發揮重要影響。戰後，西園寺繼續活躍於日本政壇，推動國內改革與外交政策，成為明治末年政界重要人物。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第二軍司令官.元帥大山巖



上圖：日本明治時代/日軍元帥大山巖手簽/Oyama 1842-1916（藏品編號:NGMH-JP-0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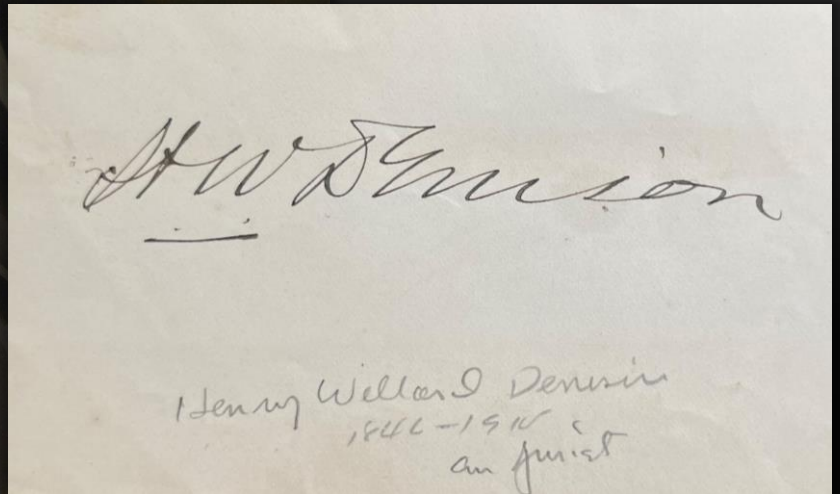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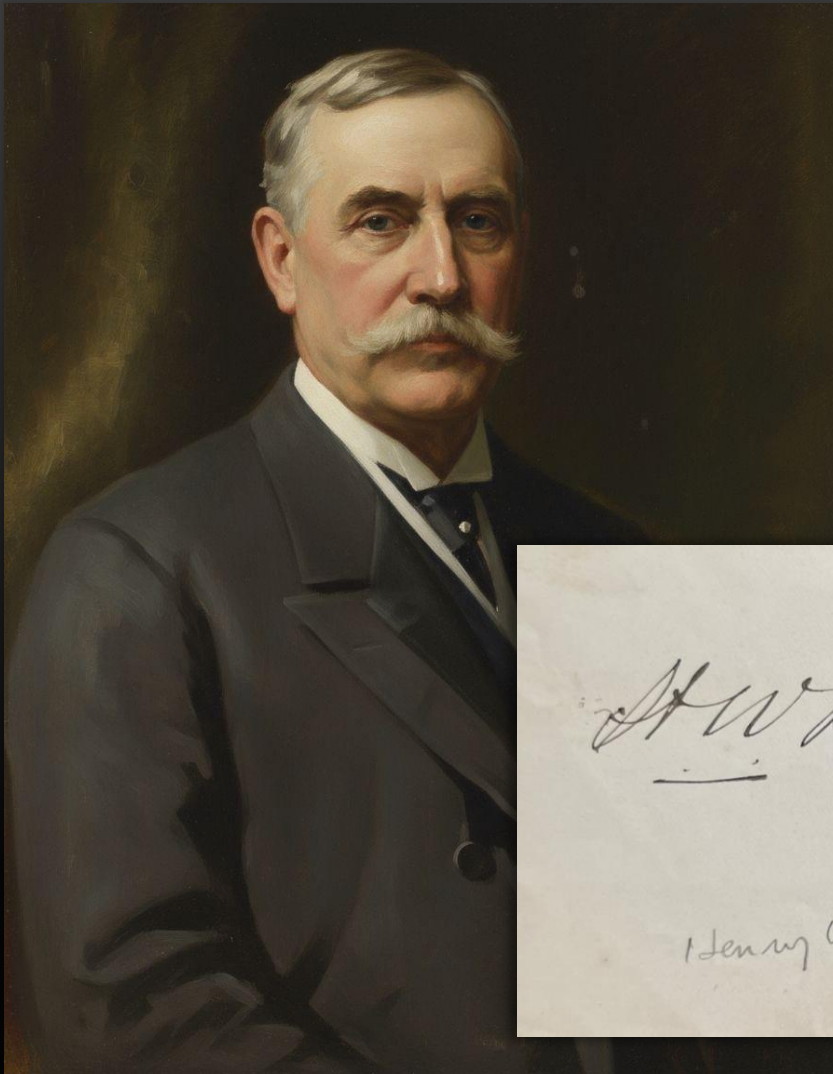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h、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

大山巖在日清戰爭中擔任日本陸軍第二軍司令官，負責指揮第二軍在遼東半島的作戰行動。1894年10月25日，他率領約3萬人的第二軍從花園口（今大連附近）登陸，未遭遇清軍有效抵抗，迅速控制了金州和大連，為後續攻擊旅順口及威海衛奠定了基礎。大山岩指揮的第二軍與山縣有朋指揮的第一軍相互配合，形成對清軍陸地防線的夾擊態勢。

他負責主持包括威海衛攻堅戰在內的重要戰役，憑藉有效的戰略部署及日軍良好的協同作戰能力，成功突破清軍防禦並最終摧毀北洋水師。大山岩一生是日本陸軍的重要將領，推動軍隊現代化，戰前即以嚴格訓練及戰術革新著稱，在甲午戰爭中發揮了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為日本贏得戰爭作出重要貢獻。

甲午戰爭海陸戰役的人物.明治日本政府的美籍外交顧問.丹尼森



上圖：Henry Willard Denison 亨利·威拉德·丹尼森（1846-1914）明治時代日本政府的美籍外交顧問。首相伊藤博文的重要輔助者，清日「馬關條約」實際的起草人。協助日本制訂馬關條約。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五、日本美籍外交顧問.丹尼森

美籍外交顧問丹尼森（Denison）在甲午戰爭中擔任日本方面的外交顧問，主要負責協助日本政府制定外交策略和進行外交斡旋。他出現在馬關條約談判現場，與清朝顧問科士達形成對峙局面。丹尼森表面上代表日本利益，實際上支持日本對中國提出苛刻的條件，包括朝鮮獨立、遼東半島及台灣割讓和高額賠款，丹尼森積極促使李鴻章接受日本的要求，為日本外交勝利起到關鍵作用。他的存在也反映出當時日本戰略是將軍事行動與外交壓力相結合，利用外交顧問在談判中施加影響，加速清政府的投降意願和簽訂不平等條約，丹尼森在甲午戰爭中主要通過外交顧問身份，推動日本對清政府的外交壓力和談判策略，協助日本達成戰爭目的。丹尼森在甲午戰爭中與日本政府的互動主要表現為他作為日本外務省的外交顧問，積極配合日本政府的外交策略。他向日本外務省說明，拒絕與清政府和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政府派出的談判代表級別不夠高，建議必須派出恭親王或李鴻章這樣高等級代表。

丹尼森訪問了美國前國務卿科士達，進一步傳達日本的立場，強調日本希望待日軍在威海衛戰役徹底擊敗北洋艦隊後再談判，以取得更有利的條件，丹尼森與日本政府保持密切溝通，支持日本拒絕清政府提出的先停戰再議和談的要求，堅持在日本境內進行談判，並且對清政府的全權代表提出苛刻的資格和身份要求。丹尼森還向日方保證自己不會給日本製造麻煩，且配合日本勸說清政府滿足日本的和約條件。他的外交活動反映了他不僅是外交顧問，更是日本政府對外策略的重要執行者，幫助日本在外交談判中取得主動，增進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戰略利益。



上圖：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獨虎圖郵票/叁拾錢/藍色/第二版/右下角殘缺（藏品編號:NGMH-QD-0080）。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六、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獨虎圖郵票

1895年，清代台灣民主國成立時，為了抗擊日本侵略並籌措軍費，於同年7月至10月期間在台南安平關開辦「獨虎郵政」，發行了被稱為「獨虎郵票」或「民主國郵票」的郵票。這套郵票採用藍底黃虎圖案，象徵台灣民主國的國旗與國徽，是一個短暫存在於台灣的共和制政權所發行的郵票。獨虎郵票的誕生經過主要是在黑旗將軍劉永福鎮守台南期間，為商民與外僑通信需求以及自籌軍餉而設立，當時郵票的設計和印製先後有多個版本，第一版使用薄紙無齒孔，後來為改進品質從廣東取得版模印製第二版郵票。獨虎郵票除了作為郵票使用外，也有可能作為軍費籌募的收據使用。這套郵票成為台灣民主國抗日歷史的重要見證，且因其發行時間短暫與特殊背景，具有相當的歷史與收藏價值。

獨虎圖郵票的設計以藍底黃虎為主體，直接源自臺灣民主國的國旗——俗稱「虎旗」的設計。郵票的圖案呈近正方形，由三個長方格圍成另一個長方格，中央格中繪有一隻形象慈祥但氣勢威武的黃虎，其形象與旗幟上的老虎相呼應。虎的意象象徵力量、勇猛與抵抗精神，代表當時台灣人民對抗日本侵略、保衛家園的決心。郵票中的虎並無生肖年的文化意涵，僅作為象徵性的國家標誌。整體設計簡潔且具有鮮明的民族認同色彩，反映了台灣民主國短暫而堅定的抗日立場與國家象徵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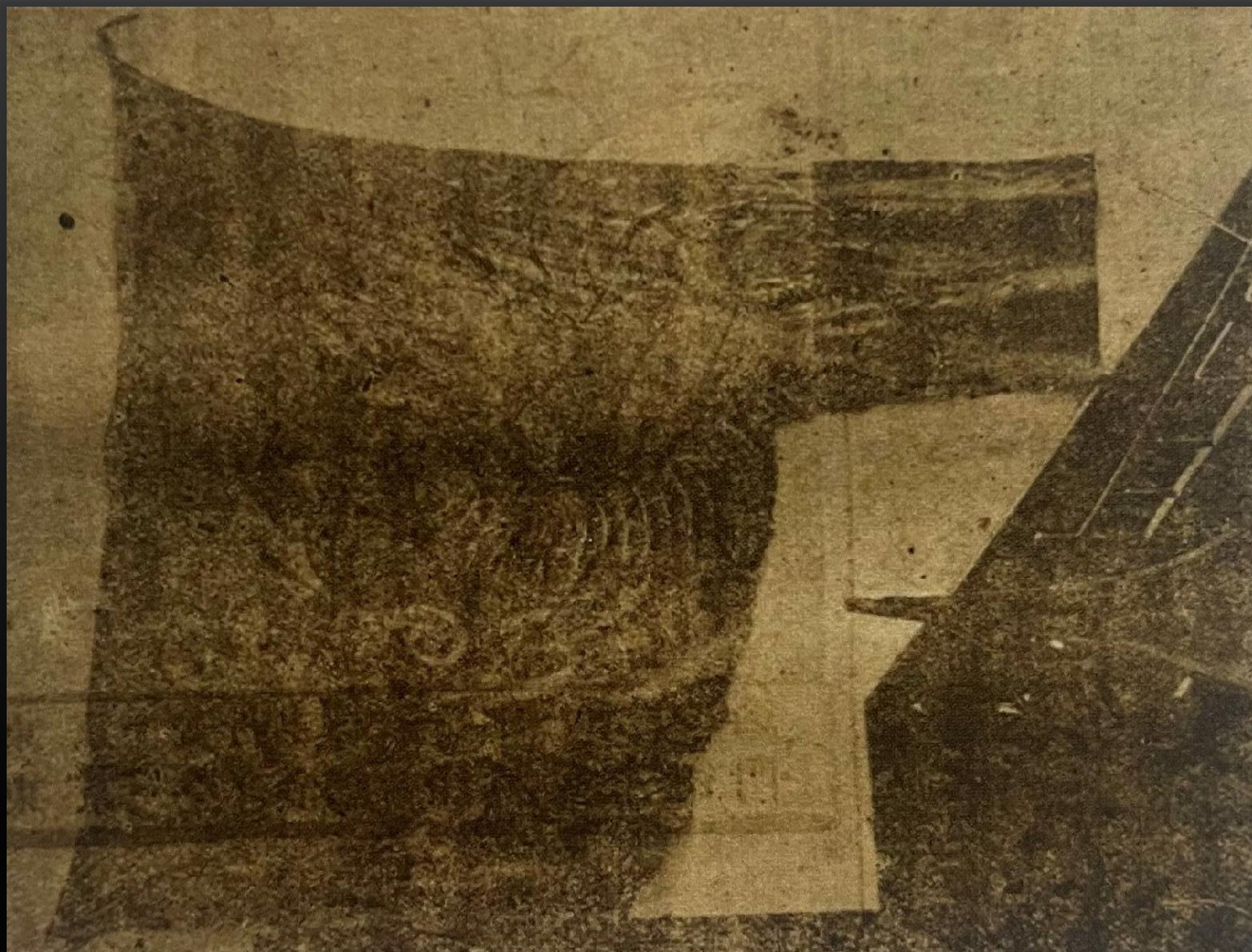
上圖：藍地黃虎旗研究叢書三冊，分別為：1. 修復報告、2. 歷史調查研究報告、3. 修復科學檢測報告。由國立台灣博物館出版。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六a、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國旗

台灣民主國的國旗 台灣民主國的國旗是藍地黃虎旗，於1895年5月23日台灣民主國成立時首次出現。旗幟的設計上，藍地黃虎旗以藍色為底，中央繪有黃色猛虎圖案，象徵勇猛與反抗精神。這設計呼應清帝國的黃地青龍旗，改以藍地黃虎代表台灣獨立意志，並依《台灣民主國臨時憲法》第四條規定為國旗與國徽。1895年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台灣巡撫唐景崧與士紳為抵抗而於5月23日宣告獨立，建立台灣民主國，唐景崧任大總統。藍地黃虎旗隨即懸掛於基隆砲台、淡水海關及台北總統府（臺南大天后宮）等三處，至少三幅大幅軍旗使用。民主國僅存五個月，日軍登陸後迅速敗亡，10月台灣全境淪陷，旗幟之消失。歷史上記錄的三幅原旗均下落不明，其中一幅可能被日軍運回日本藏於皇宮，但確認已佚失。目前無真品原旗存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僅有數位重建版及高橋雲亭版複製品，經考證最接近原貌，並列為文化部國寶。

文獻記載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至少有三面原旗，分別懸掛於巡撫衙門、基隆砲台及淡水海關，後均下落不明。三面旗幟位置 巡撫衙門旗，懸於台北總統府（臺南大天后宮），日軍攻陷後落入日軍手中，作為戰利品獻給天皇，藏於日本皇宮振天府內，但後已佚失。基隆砲台旗，1895年5月26日懸掛，遇大雨虎形模糊，後被日軍運回日本，也可能為皇宮藏品母本，但原旗確認下落不明。淡水海關旗，民主國成立前送給稅務司馬士，馬士未懸掛，後續去向無明確記載。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系統及相關報告詳細記述三旗位置與推測去向，基於陳昌基手稿《臺島劫灰》及馬士報告。台灣文化部及臺博館新聞稿進一步考證，三原旗均已散失，僅存高橋雲亭摹本。

清代1895年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圖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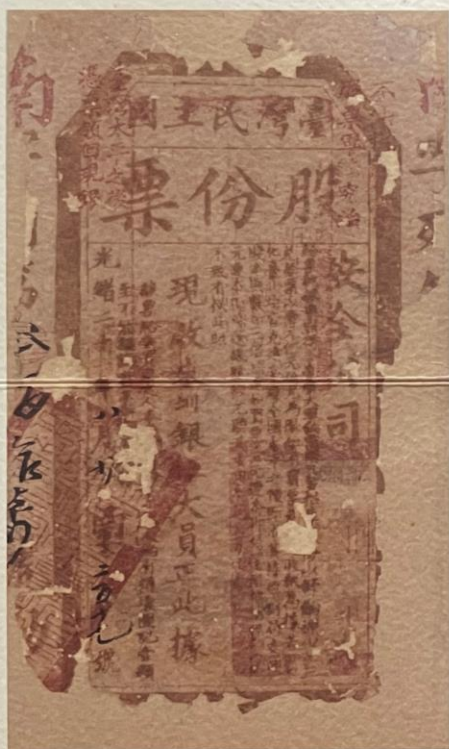


上圖 :1909年11月28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黃虎旗照片（圖片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左下圖 :1940年廣田弘毅參觀照片,右下:圖黃虎旗影像局部放大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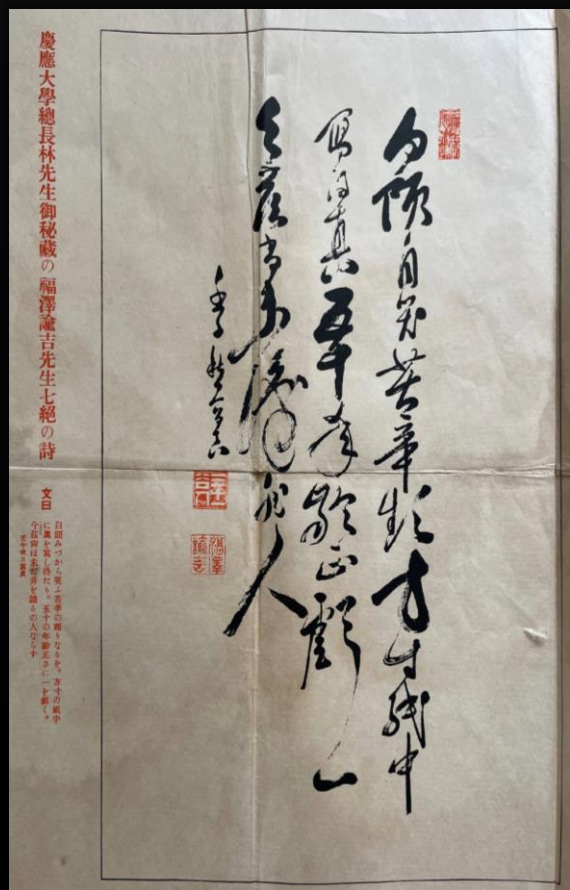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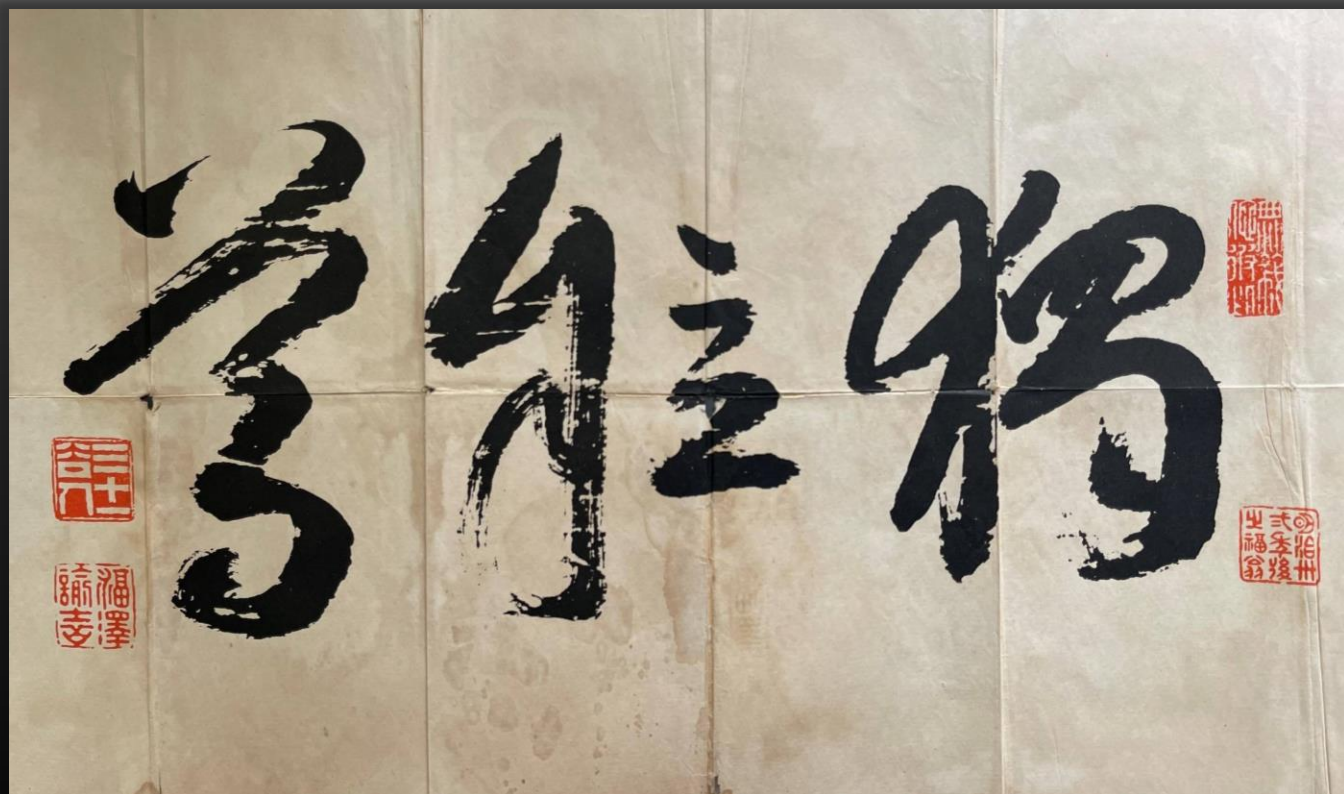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博物館
小翠藝術學院
322特

舞台盡失的島嶼獨虎，憤怒無助，忍辱不服輸縱然吼出驚天動地的第一聲民主，卻彷彿尚未初始便已結束的歷史筆誤。
 原圖：《台灣民主國郵票》原件 光緒21年(1895)
 複製：林玉山根據 中華民國42年(1953)5月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珍寶

國藝會企劃(2007, 1000)

上圖：國立臺灣博物館小翠藝術學院/國藝會企(200.1000)製作的黃虎旗摺疊卡，並以絹質作為材料，製作非常精美。內文寫道：「舞台盡失的島嶼獨虎，憤怒無助，忍辱不服輸縱然吼出驚天動地的第一聲民主，卻彷彿尚未初始便已結束的歷史筆誤。」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福澤諭吉先生の御眞蹟
慶應大學御所藏



上圖：福澤諭吉書[獨立自尊]印刷品（藏品編號:NGMH-JP-0060）。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甲午後日本啟蒙之父福澤諭吉

六b、福澤諭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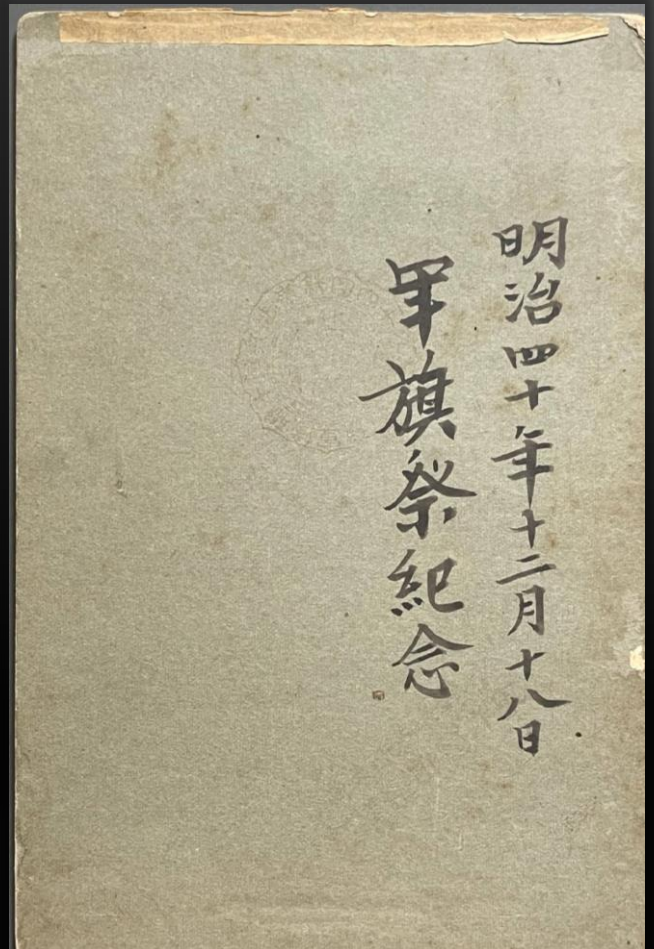
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和教育家。1835年1月10日出生於大阪附近的下級武士家庭，原屬中津藩。19歲時前往長崎學習蘭學，這成為其人生轉捩點，後在大坂適塾深造並成為優秀生徒。1858年奉命在江戶開設蘭學塾，1868年改名慶應義塾，成為日本近代私學先驅，並於1871年移至三田校址。

他還參與一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機構創立，並著有《學問のすゝめ》，大力推廣西學啟蒙。創辦《時事新報》，倡導不偏不倚立場，並支持科學研究如傳染病研究所。1901年2月3日逝世，其肖像印於一萬元日鈔，影響明治維新深遠。有日本近代發展啟蒙之父的美譽。



上圖：1984年11月1日發行以福澤諭吉作為頭像的壹萬圓日圓紙幣。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明治四十年(1907年)的日本



上圖：明治四十年(1907年)的日本軍旗祭十二月十八日的照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六c、明治四十年(1907年)的日本

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未發生大規模戰爭，僅有小型軍事行動，如對俄國海軍殘餘的局部勝利及鎮壓國內社會運動，主要依賴日俄戰爭的餘威。日本透過日俄戰爭勝利，已躍升亞洲第一強國，掌控朝鮮半島並獲國際承認，簽訂英日同盟強化外交，成為列強一員，遠超清朝及俄國影響力。

日本軍事擴充源於明治維新「富國強兵」政策，為防範西方列強及俄國威脅，甲午戰爭（1894-1895）及日俄戰爭勝利後自信膨脹，軍費佔國家預算40%以上，用於建造「八八艦隊」，野心指向中國東北及太平洋擴張，奠定軍國主義基礎。這時日本未參與大規模主要戰役，只有休養生息的狀態，僅有小型軍事行動及外交相關衝突。對俄國殘餘勢力日俄戰爭後續清理，如海軍殲滅俄艦殘部，無正式戰役紀錄。國內鎮壓：處理社會運動及部落衝突，如對北海道及台灣原住民的治安作戰，但非全國性戰役。國際上日本專注鞏固日俄戰爭勝利果實，簽訂《日英同盟》續約及《日韓條約》，軍事上無亞洲或海外主要戰役，轉向海軍擴張準備。（完）



上圖：金屬製日治台灣總督府擺設。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參考文獻

一.內部使用文獻：

延陵科學綜合室
檔案彼岸花工作室（模型製作）
延陵格物研究組
延陵科學綜合典藏圖書閣
延陵科學綜合室歷史文化收藏庫

二.文籍資料：

- [1] 《日寇志.黃解祭》延陵科學綜合室 2004
- [2] 台灣華視「紀念甲午戰爭100週年」歷史紀錄片/特輯（1995年）英屬香港.亞洲電視粵語版本
- [3] 《馬關條約》作者：吳相湘臺灣商務印書館或國史館
- [4] 《春帆樓與馬關條約》下關市教育委員會 編 山口縣下關市教育委員會1995
- [5] 《昂貴的和平：中日戰爭與馬關條約的誕生》（修訂版）作者 吉辰 聯經出版公司
- [6] 《日清講和紀念館圖錄》日清講和紀念館 編 下關市立歷史博物館 / 日清講和紀念館
- [7] 《春帆樓物語：從醫院到馬關條約會場》如林平四郎 海鳥社
- [8] 《春帆樓と日清講和：条約の現場史》下關史談會 山口縣地方史料刊行會
- [9] 《日清戦争：近代日本初の對外戦争の實像》大谷正（Ōtani Tadashi）中央公論新社
- [10] 《東亞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大江志乃夫 立風書房
- [11] 《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 編 有斐閣 / ゆまに書房
- [12] 《清日馬關條約與東亞秩序的變動》東亞近代史學會 編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13]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S. C. M. Pa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